Review of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Studies
會計審計論叢，第 15 卷第 2 期，2025 年 12 月
第 121-182 頁

廢除遺贈稅是租稅競爭的策略嗎？合成控制法的應用

許義忠*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

葉泓葦
中鋼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收稿日：2024 年 8 月 21 日；接受日：2025 年 10 月 30 日

摘要

外人直接投資是促進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國政府透過各種租稅競爭策略希望吸引外人直接投資流入，本文利用合成控制法，探討在 1994 年至 2018 年間，於 2000 年後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 OECD 國家的外人直接投資表現進行反事實分析，進而研究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外人直接投資流入之政策效果。研究結果發現，若單純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則政策效果並無法增加外人直接投資流入之動力，若要持續吸引外資投入需有更多政策相互配合，僅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則需要更多時間才能反映成效或無法長期持續帶動外人直接投資流入。本研究之成果可提供欲藉由透過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作為租稅競爭，以吸引外人直接投資流入之國家做為參考。

關鍵詞：遺產及贈與稅、外人直接投資、合成控制法、租稅競爭

* 通訊作者：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教授，地址：404336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連絡電話：(04)2219-6096，Email: hsuyichung@yahoo.com.tw。作者非常感謝總編輯與三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之寶貴意見，文中言論由作者自行負責。

臺灣人文與管理期刊資料庫

Review of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Studies
Vol. 15 No. 2, December 2025
pp.121-182

Is the Abolition of Inheritance Tax A Strategy of Tax Competition? An Application of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Yi-Chung Hsu*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Wei Yeh
C. S. Aluminium Corporation

Received 21 August 2024; accepted 30 October 2025

Abs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s one of the key drivers of economic growth. Consequently, many governments adopt various tax competition strategies to attract greater inflows of FDI. This study employs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to conduct a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of FDI performance in OECD countries that abolished inheritance (estate and gift) taxes after the year 2000, using data from 1994 to 2018. The objective is to examine the policy effect of abolishing inheritance taxes on FDI inflow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erely abolishing inheritance taxes does not, by itself, generate sufficient incentives to boost FDI inflows. To sustainably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such tax policy changes must be complemented by other supportive measures. Without accompanying policies, the abolition of inheritance taxes alone may require a longer time to yield observable effects, or may fail to sustain increased FDI inflows in the long term.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may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countries considering the abolition of estate and gift taxes as a means of engaging in tax competition to attract FDI.

Keywords: Inheritance (Estate and gift) tax,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Tax Competition

* Correspondence to Yi-Chung Hsu, Address: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 Tax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o. 129, Section 3, Sanmin Road, North District, Taichung City 404336, Taiwan; Tel: (04)2219-6096; Email: hsuyichung@yahoo.com.tw. The authors sincerely appreciate the valuable feedback from the anonymous reviewers and the editors.

臺灣大學會計資訊庫

壹、緒論

2011 年天下雜誌在一篇名為「遺產及贈與稅一定要降」的文章中指出，台灣鄰近的國家大部份已都無遺產稅，因此若要提供誘因讓台商將其海外資金匯回台灣並從事投資，參與國內建設與經濟發展，則勢必得調降遺產稅(陳一姍與賴建宇 2011)。隔年 2012 年，前遠雄集團董事長趙藤雄在中華民國開發工會聯合理事會理事長任內，積極向政府單位提出各種建言，而在一篇題為「遺產稅逼走的資金，比拿到的多」的報導中，更點出倘若台灣能廢除當時高達 40%的遺產稅，則國人在海外所賺的資金將有誘因匯回台灣，同時他也不諱言地提及新加坡因為調降了遺產稅率，因此稅收不減反增。在該篇報導中提到台灣的稅制太過複雜，外資進來台灣之前得先了解台灣的稅制環境以及各種稅率，甚至台灣針對外資在台投資並沒有任何減稅措施(陳穎勳 2012)。

所謂的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是指外國企業為了獲得經濟利益，將資本投入他國經營或生產，FDI 可以帶入充沛的資金彌補國內的資本不足，並引進新技術或新產品產生技術外溢，促進產業發展降低失業率，達成經濟長期穩定發展之目標。過往大多文獻亦顯示 FDI 有助於經濟成長，例如 Alfaro et al. (2004)研究結果顯示 FDI 可以透過金融市場帶動經濟發展，而 Srivastava and Talwar (2020)文中亦指明外人直接投資(FDI)對 GDP 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因此，該如何吸引外人直接投資流入乃為各國政府促進經濟成長的主要思考方向。圖 1 為 OECD 各國 FDI 趨勢圖，由圖中可看出近年來 OECD 國家的 FDI 大多呈現下滑趨勢，尤其以奧地利、比利時、捷克、愛沙尼亞、冰島、荷蘭、挪威、斯洛伐克與瑞典等國家最為明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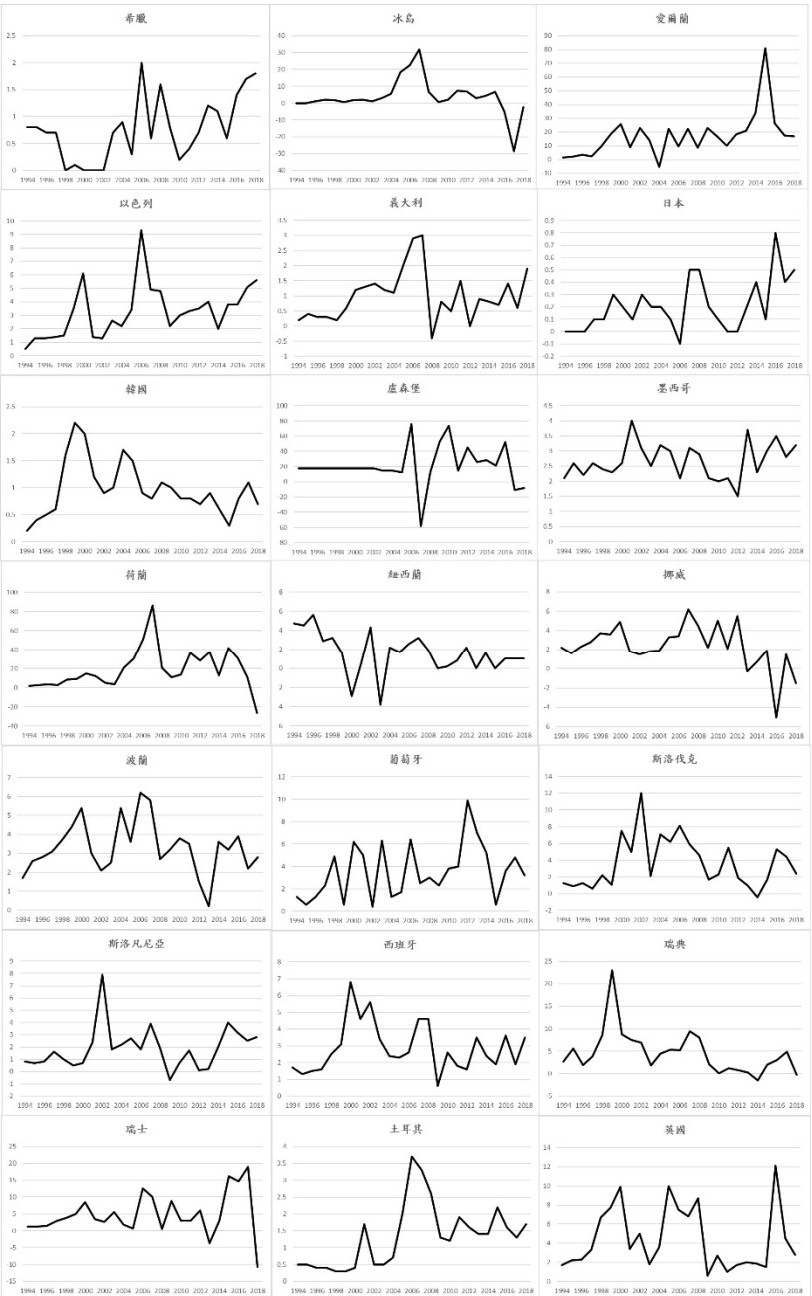


圖 1 OECD 各國 FDI 趨勢圖

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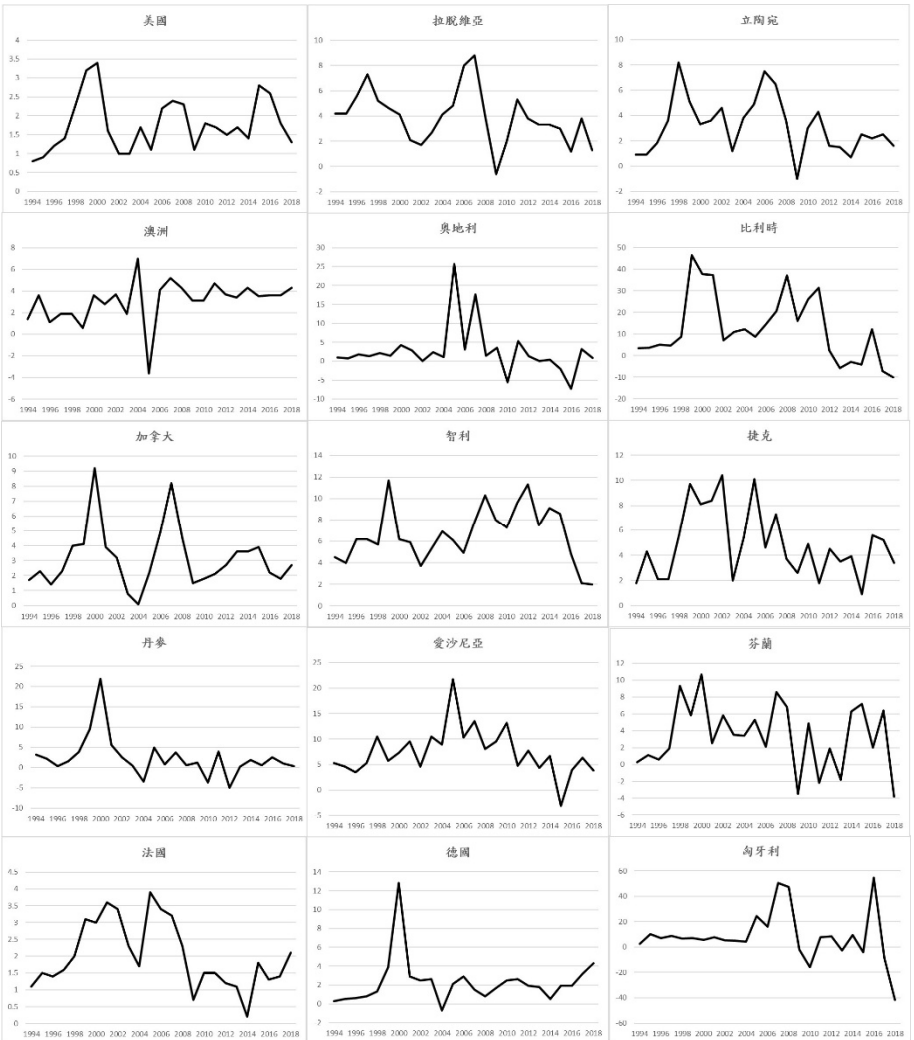


圖 1 OECD 各國 FDI 趨勢圖(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此，為了促進經濟成長，這些國家的政府無不希望能透過各種政策來吸引外資流入。根據徐耀浤(2010)的研究，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將吸引外資投入的政策分為財務獎勵(financial incentives)、財政獎勵 (fiscal incentives)、管制性優惠 (regulatory incentives)、補貼式服務 (subsidized services)、市場特權 (market privileges)以及外匯特權 (foreign exchange privileges)等共 6 種。其中透過財政獎勵吸引外資流入的方法大多是採用降低稅負的方式，例如降低與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率、進口機器設備關稅減免、出口退稅等。

事實上，從經濟競爭的角度而言，資本由於具有高度移動的特性，因此在國際化的潮流下，若某國相對於他國的稅率過高，將會導致資金外流，所以若想吸引外國資金流入，租稅競爭便成了各國政府重要的策略。一般而言，租稅競爭(tax competition)指的是各國政府透過降低稅率或提供稅務優惠來吸引企業、資金與高資產人士。因此，世界各國政府乃競相藉由調整稅制，以確保國內經濟競爭力並防止資本外流。積極面而言，政府應創造更多有利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至台灣投資。就租稅競爭策略而言，以當前眾多的租稅競爭策略中，遺產與贈與稅會是一個吸引的良好策略嗎？根據國政基金會的報告指出，香港自 2006 廢除遺產稅後，外國在港資金從 2100 億元大幅成長至 1 兆 2000 億元，而新加坡在遺產稅稅率由 40%調降至 10%以後，也帶動海外資金大量回流，可見遺產稅稅率的調降的確似乎可能吸引外國資金回流(李禮仲與周信佑 2008)。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就台灣而言，以薛凌立法委員為首等 6 位委員曾於 2008 年立法院的院內提案中，推動「廢除遺贈稅、吸引資金回流、建設台灣」法案。該提案有鑑於台灣當時遺產及贈與稅之稅率較世界各國稅制仍高，導致國人採取租稅規劃來規避稅負，同時由於此項稅目稅收少但稽徵成本高，易使資金大幅流出台灣(薛凌 2008)。故為了強化台灣全球競爭力、活絡台灣經濟，因此該提案乃建議政府應透過稅改，廢止遺產及贈與稅法。雖然最終我國並未廢除遺贈稅，但仍於 2009 年將遺贈稅稅率由 50%大幅調降至 10%。根據當時財政部部長指出，此舉稅改的確亦吸引了大批資金回流投資，因此對當時金融海嘯後的低迷經濟也帶來景氣復甦效果。

事實上，就租稅策略而言，香港與新加坡分別於 2006 年及 2008 年廢除了遺贈稅，此項做法使這兩個地區成為高資產人士和跨國企業家的青睞。反觀同樣是位於亞洲中的韓國，卻因為遺產稅稅率過高，而成為資金外流的原因之一。是以，在資本跨國流動頻繁的時代裡，若以遺產稅作為租稅競爭工具之一，透過廢除遺產稅或稅率調整、稅收優惠，甚至是信託與公益捐贈機制等多元手段，將可能達成吸引資本與促進經濟發展的雙贏目標。

然而關於廢除遺產稅政策(或調降遺贈稅)是否能吸引 FDI 流入，目前文獻上則是鮮少著墨。是故，本文主要貢獻首先乃在於驗證若以廢除遺產與贈與稅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來做為租稅競爭之手段時，是否能對 FDI 造成影響。透過本文的研究可以驗證一般人模糊不清且又似是而非的觀念，究竟廢除遺產與贈與稅是否真的是吸引外資的萬靈丹呢？是故，為了比較真實情況與反事實之差異，本文將採用近年來新興的研究方法-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SCM)做為分析工具，並以 OECD 中已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國家為樣本，模擬未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反事實數據，再與現實中已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實際數據進行反事實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據此分析 OECD 各國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做為租稅競爭手段時對外資流入之政策效果。其次，本文不僅在於評估遺贈稅「廢除」政策的平均效果，更在於揭示不同政策替代方案下的異質性影響。相較於既有文獻多以「是否課徵遺贈稅」作為二元政策比較，本文強調不同政策形式(如稅率調整、稅基擴大或課稅時點延後)對外人直接投資的反應可能具有顯著差異。此分析有助於更精確辨識租稅競爭策略的邊際效果，並對未來政策設計提供具體參考。

本文共分為 5 章，第 1 章為緒論；第 2 章為文獻回顧，首先說明 FDI 對經濟成長之影響，接著再討論租稅競爭如何影響 FDI 流入之相關文獻，然後再回顧採用遺產與贈與稅做為租稅競爭手段的相關研究。第 3 章為研究方法，說明本文使用之計量方法-合成控制法及相關變數；第 4 章為實證結果，除了呈現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 FDI 流入之政策效果外，並對結果進行分析。另外，也透過限縮樣本及新增控制變數做為穩健性分析；第 5 章則為本文之結論與建議。

貳、文獻回顧

外國直接投資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一直是文獻中的重要研究議題，黃登興 (2012)以東南亞為研究對象，探討外人直接投資是否對經濟發展具有影響，該文實證結果顯示外資的確對東南亞經濟具有正面影響，特別是在 1986～1997 年間。Srivastava and Talwar (2020)則透過探討人類發展指數(HDI)、外人直接投資(FDI)以及經濟成長三者之間之關係，發現 HDI 和 FDI 皆對 GDP 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而 Öztürk and Suluk (2020)也以美國為研究對象，使用 Granger 因果關係(Granger causality test)分析，發現 FDI 可以促進經濟成長。尚有更多文獻顯示，FDI 流入確實在一國經濟成長中確實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此，各國政府為了吸引外人直接投資(FDI)，採用的策略可說是相當廣泛，租稅競爭策略便是其中一種，而究竟租稅競爭與外人投資有何關係？以及遺產及贈與稅與外人直接投資的關係又為何？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租稅競爭與外人直接投資

租稅競爭是各國政府為了吸引外人直接投資時的常用手段，然而透過租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競爭策略真的能成功吸引外資流入嗎？就理論分析而言，Janeba (1995)曾指出在全球資本高度流動的情況下，企業所得稅與跨國投資政策將會受到挑戰。因此，該文應用賽局理論驗證課稅制度(如免稅、抵稅、扣除)以及雙重課稅協定，必會影響外人直接投資(FDI)。Davies, Egger, and Egger (2010)則研究利潤稅在對於跨國企業決定如何透過出口或外人直接投資，而進入國外市場所應扮演的角色為何時，證明了在有租稅協定的前提下，即便會產生社會福利成本，跨國企業仍會選擇外人直接投資。但是若通過租稅競爭，東道國通常會限制出口而不是強制外國直接投資。換言之，租稅競爭的策略將優於租稅協定。另外，Sanjo (2011)曾採用不同市場規模的兩國模型，分析考慮國家風險的外國直接投資與租稅競爭。文中指出，既便不同國家存在不同的國家風險，但倘若高風險國家的市場規模相對於低風險國家仍足夠大，則地主國家就算課徵租稅，外國企業仍會基於利益最大目標而選擇高風險的國家。次年，Kim et al. (2012)也以東亞及中歐的小型經濟體為研究對象，採用三個非對稱國家模型，探究當優惠貿易協定形成後對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租稅競爭策略有何影響。研究中證明，優惠貿易協定的形成將為上述的小成員國提供競爭優勢，並足以與大成員國競爭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

此外，Dewit et al. (2018)也建構了一個企業租稅競爭模型，該研究中特別指出政府可以利用公共基礎建設設施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從而提高其稅基。但是該文亦指出倘若政府採行租稅協定，則也有可能會影響基礎設施有關的投資，因此兩者比較後發現，租稅協定合作下的福利可能會反而低於租稅競爭下的福利，特別是在有負跨境外部性存在時之情況。另外，Davies et al. (2023)指出當政府在租稅優惠與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競爭時，亦可能對外人直接投資產生競爭。而模里西斯(Mauritius)雖制定了許多政策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但是在Beebeejaun (2023)的研究分析中卻發現，該國的稅收收入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卻是一直下降。因此，文中乃將模里西斯所制定的有關法律與英國和美國的相關立法進行對比分析。

除了理論模型的研究外，在實證分析部分，林智聖(2013)曾探討台灣調降營所稅稅率是否能吸引海外資金回流，並以持股超過 1%大股東持股金額、境外股利的匯回、股市成交量作為資金回流的替代變數，實證結果顯示調降營所稅確實有助於海外資金回流。施若盈(2013)以台灣為樣本探討調降營利事業所得稅對 FDI 之影響，研究結果亦顯示調降營利事業所得稅對於「各來源地區」與「各產業」之 FDI 流入皆有顯著的增加，符合政府減輕稅負吸引外資流入之預期。另外，陳麗如(2016)對 34 個國家進行跨國實證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良好的租稅環境對 FDI 流入有顯著的影響，不但能減輕國民的租稅負擔亦可吸引更多 FDI 流入，而在該文的實證模型中亦顯示，開放程度、勞動力參與率及政府治理對於 FDI 之影響顯著為正，但健康支出對於 FDI 的影響顯著為負。沈晉瑋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2019)則以關稅及稅賦政策對 FDI 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租稅政策對於貿易開放程度、產業發展具有影響力，並可間接影響 FDI 之流入，故可透過調整關稅與整體賦稅負擔率，提升貿易開放度，來達成擴大 FDI 流入之目標。

而在國外的研究中，Azémar and Delios (2008)利用日本 1990 年至 2000 年的資料分析租稅競爭與 FDI 之關係。實證結果指出，儘管發展中國家的租稅競爭可能相當激烈，但此種競爭不應該導致這些國家在爭奪 FDI 流入時的有效稅率為零。國際上有關租稅競爭的文獻大部分都忽視了租稅合作在國際稅收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因此 Rixen and Schwarz (2009)在他們的研究中納入德國的 45 項雙重租稅協定進行研究。除此之外，Hansson and Olofsdotter (2013)針對租稅差異和聚集經濟對 FDI 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文中以歐盟 15 個國家為樣本，發現技術外部性和經濟活動的集中度都會對 FDI 流動產生影響。而 Yurdadog and Albayrak (2019)也以 1995 年至 2015 年的追踪資料分析歐盟成員國之間是否存在租稅競爭，實證結果指明公司稅率與 FDI 具負向顯著關係，而政治穩定與否與 FDI 以及國家規模和公司稅率之間則是呈現正向顯著。再者，由於跨國公司的競爭可能產生的效率損失，已經成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及學者關注的議題之一。因此，Davies and Naughton (2014)提出了一個理論模型，同時也以 139 個國家超過 20 年的資料，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排放稅競爭進行分析，文中模型指出，由於跨境污染的存在，這種效率損失將在相鄰近的國家最為嚴重。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在租稅競爭策略中除了以理論模型分析稅率高低對 FDI 的影響之外，實證研究中有關租稅競爭之策略，也大多從營利事業所得稅、關稅、排放稅以及公司稅率等不同面向討論如何吸引 FDI 流入。

二、遺產及贈與稅與外人直接投資

遺產及贈與稅的存在與否，與企業的資金流動、稅務規劃和投資行為均存在一定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就直接影響而言，遺產及贈與稅可能影響外人長期在台佈局的意願。一般而言，外人來台直接投資時，特別是設立子公司或者持有長期股權，通常都會考量到未來的資產傳承或者股權移轉的安排。一旦設立了台灣子公司並持有大量股權，未來若過世或將股權贈與子女，將可能牽涉到遺產與贈與稅。若以間接影響觀之，過高的稅負亦有可能會導致這些外資選擇改以其他形式進行間接投資，例如合資公司或區域控股公司，進而規避潛在的稅負風險。反之，較低或甚至無遺產稅的國家將更容易吸引高資產的外資家族或企業進行長期投資與佈局。因此，倘若台灣的遺產與贈與稅率過高，將有可能影響其長期在台佈局的意願以及財富傳承。再者，家族辦公室(family office)與私人財富管理機構，通常希望尋找稅制穩定、稅負較輕的地區設立據點。因此，過高的遺產與贈與稅率，將會讓高資產外國人士傾向選擇其他稅務友善的地區(如新加坡)，而不願在台設立投資公司或進行不動產、金融資產投資。換言

臺灣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遺產及贈與稅可視為是整體「投資環境競爭力」的一環。雖然外資主要關注企業所得稅、資本利得稅等直接稅，但在考量「離開市場」或「資產轉移」成本時，遺贈稅也是考量因素之一。

然而，最適的遺產稅究竟又該如何決定呢？Piketty and Saez (2013)曾試著透過個體數據分析推導最適遺產稅的公式，在其研究中指出，當財富分配如果愈不平等時，最適遺產稅的稅率應該愈高。而 De Nardi and Yang (2016)則是以動態隨機模型分析遺產稅可能帶來的財富影響，該文研究結果顯示，若提高遺產稅率將會降低財富集中度。

事實上，楊陳旺(2009)曾探討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作為租稅競爭手段藉以吸引 FDI 的可能性進行分析，該文以香港廢除遺產稅之前後兩年資料為樣本，探討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海外資金回流之影響，並以持股比率 1%以上之自然人股東的持股金額，作為資金回流之代理變數，發現廢除遺產稅確實能促進海外資金回流。文中指出，因為台灣與香港的經濟情況頗為類似，也同屬於出口貿易導向國家，所以當台灣的報酬率與香港若是差異不大時，廢除遺產稅所帶來的影響則不得不重視。以香港在 2006 年取消遺產稅的改革為例，資本市場之資金確時有回流現象，藉由減少每年 15 億港幣的遺產稅稅收換得 1.6 兆港幣的資金流入。換言之，香港遺產稅的調降不僅吸引世界的資金入港投資，更是鞏固了香港在當時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

此外，李彥幸(2011)也研究遺贈稅稅率調降是否使資金根留臺灣及促使海外資金回流，研究結果顯示海外資金有顯著回流，但調降遺贈稅稅率尚非單一或主要因素，透過證券交易稅稅收的顯著增加，亦顯示了資金回流確實有投入股市，但土地增值稅於短期內尚無顯著成長。侯旭娟(2013)則探討遺產及贈與稅改前後對海外資金及賦稅收入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遺贈稅稅率調降政策對國人海外資金影響並不顯著，但遺贈稅稅率調降對遺產、贈與稅收有顯著影響，但二者之變動方向相反，稅改後的遺產稅稅收減少，但贈與稅稅收增加。朱澤民等(2016)研究我國遺產及贈與稅稅制檢討，提出稅基檢討、以增設課稅級距方式調升邊際稅率、信託贈與課稅與遺產稅納稅義務人調整等短期三大改革方向，中長期之改革則以遺產與贈與兩稅稅基之整合(兩稅合一)，可採捐贈人為租稅主體之終身財富移轉稅，或受贈人為主體之終身財富受贈稅。

儘管遺產稅被認為是一種具有再分配潛力且激勵相容的稅制，但 Genschel et al. (2024)卻指出自 1960 年代以來，其全球普及程度顯著下降。儘管早期遺產稅之所以被引進，主要是為了因應迫切的財政需求，然而，隨著所得稅與消費稅的發展，政府逐漸倚賴更具稅基廣度與徵收效率的現代稅種，遺產稅的財政角色式微，其被廢除的風險也隨之上升。是以，該文乃透過對 87 國的歷史資料分析，解釋了遺產稅的興衰。

La (2023)曾建構一個理論模型，並引入企業規模分布的概念，來解釋降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族企業遺產稅對經濟的潛在效益。文中透過南韓實證數據進行校準，模擬結果顯示在納入企業規模差異後，減稅對經濟的淨效益為正。同時在該文的研究中也分別使用希臘與德國的資料進行穩健性測試。就希臘而言，在 2003 年將家族企業遺產稅從 20% 降至 1.2%，投資會成長 4.2%。而在德國方面則發現當遺產稅對繼承銷售企業的課稅增加，而家族企業本身的稅負降低時，整體 GDP 會增加 0.73%。而 Anderwald and Niemann (2023)則是探討在財富不均日益嚴重與政府財政壓力加劇的背景下，淨資產稅(net wealth tax)是否仍是一項可行的稅收工具，並分析其在 OECD 國家的發展狀況，同時討論繼承與贈與稅是否可作為更合理的替代方案。該文也指出在全球化與資本高度流動的今日，對高資產者徵收資產稅可能造成資本與人才的外流，進一步削弱一國的競爭力。尤其當不同類型資產估價不一致時，容易造成投資扭曲與稅基流失，影響整體經濟效率。

González-Val and Marcén (2024)探討西班牙各地區遺產稅差異對人口成長的影響。文章中利用 1998 至 2017 年間西班牙各地的遺產稅改革，建構出一套動態的差異中之差異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模型，分析地區人口變化與稅制之間的因果關係。研究發現，在小額遺產的情境下，地區若擁有比鄰近地區更多的遺產稅減免，短期內(約 1 至 4 年)能明顯提高地方人口成長率，其影響幅度約佔標準差的 6%。但這樣的效果通常在第七年後消失，甚至轉為負面。大額遺產雖也有些微正向效果，但統計上不顯著，且同樣在長期出現負面影響。

綜上所述，調降或廢除遺產稅與贈與稅的政策，確實可能影響資本移動，包括國人將資金自海外匯回的情形，雖然現有研究多數聚焦於遺產稅變動對國內財富移轉、家族避稅行為、或資產配置策略的影響，但對於遺產稅是否會影響國際資本、特別是外國企業在特定國家進行實體投資的決策，相關實證研究仍較為稀少。

雖然現有文獻主要聚焦於遺產與贈與稅對本國居民的行為反應，但其對資本配置與經濟活動的扭曲性影響，亦可延伸推論至外人直接投資的決策行為。Walczak (2017) 報告中探討美國各州遺產與繼承稅制度之差異與變遷。特別也指出稅收對高淨值個人遷移，例如富人搬離高稅州，以及稅制對小企業與家族企業的影響。在其報告中說明了遺產與繼承稅削弱投資誘因、降低創業與資本累積意願。換言之，遺產稅會降低投資、抑制企業擴張，並可能使高資產族群離開，而這些效應若存在於美國，將代表稅收環境可能間接影響外資的區域選擇與資金流向。此意味可能帶走其企業或資本，對吸引外國投資環境不利，反之若廢除或降低遺產稅將具吸引力。

另根據 Burman et al. (2018) 對美國資料的分析，遺產稅預期負擔會降低企業主持續自營的可能性，並可能促使其提早退休；而較小的遺產也限制潛在繼承人創業或投資的能力。該研究顯示，僅因預期課稅而導致的行為改變，已足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以產生經濟效率上的損失與資本投入的減少。若將此邏輯延伸至跨國資本移動，則可合理假設遺產與贈與稅的存在，可能使高淨值外國投資者傾向選擇無此類稅負或稅負較低的國家，以保障其資產在未來世代間的傳承效率。此一假設亦為部分 OECD 國家(如瑞典、挪威、奧地利與捷克)選擇廢除遺產稅作為租稅競爭工具的潛在邏輯基礎。

儘管現有文獻多集中於企業所得稅對外人直接投資的效果，然而稅收誘因的理論基礎亦可延伸至其他稅種，包括資產移轉相關的遺產與贈與稅。根據 Giertz et al. (2012) 的回顧，FDI 對於總體稅制環境具有高度敏感性，企業在考量投資地點時，除了法人稅率外，也會衡量整體稅負與資本保全成本。若遺產稅構成高淨值個體或家族企業跨國資金配置的潛在障礙，其存在便可能成為影響 FDI 決策的隱性因素。雖目前實證研究仍以所得稅為主，未來對遺產稅制度的跨國比較研究，或可補足此一論述缺口。

因此，在 OECD (2021) 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分析遺產稅如何透過降低財富轉移成本提升稅制效率，並指出具較低遺產稅的國家更易吸引國際資本與高資產族群。此外，遺產稅亦可視為跨境投資者的資本成本之一，更是外國企業進入市場時考慮的整體稅務負擔(如實質稅率、租稅透明度)。是以，遺產稅的降低或廢除可解讀為租稅競爭策略之一，與一般降低公司所得稅、營運稅同屬一類可吸引跨國企業的制度設計。政府可以透過降低稅率或廢除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人力與資本流動。Gale et al. (2025) 認為遺產稅對企業資本投入與成長意願具有直接干擾，也是外資在考慮在地設廠與長期經營投資的參考基礎。

再者，就理論層面而言，遺贈稅可視為一種對「資本存量」徵收的稅賦。依據 Ramsey (1928)、Cass (1965)以及 Koopmans (1965)文中所提之跨期資本累積模型，資本課稅將改變投資者的最適化儲蓄與投資路徑，進而影響長期的資本形成與配置。雖然遺贈稅在課稅型態上有別於傳統的企業所得稅，但其作用機制等同於在跨期投資決策過程中增加對資本存量的有效稅負，從而降低投資者在特定地區進行長期佈局的誘因。Janeba (1995)與 Davies, Norbäck, and Tekin-Koru (2010)的研究也指出，跨國企業與高資產個體在決定 FDI 地點時，通常會將稅後資本報酬率與有效稅負納入考量。在此架構下，遺贈稅的存在將擴大不同國家之間的有效稅率差異，對跨國資本的配置產生潛在影響。換言之，遺產及贈與稅對家族企業與世襲財富的傳承乃具重要意涵(De Nardi and Yang, 2016)，高稅率制度將增加家族企業跨世代承接的財富損耗，進而抑制外國家族資本於該地設立子公司或配置資產的誘因。綜上所述，遺贈稅作為資本存量課稅，透過跨期資本累積與跨國資本配置兩條路徑將會影響外人直接投資，而其分析的脈絡可與企業所得稅對 FDI 的既有研究並置於一致的理論基礎上。

是以，本研究將主要聚焦於此類稅制變動對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間接影響。探討 OECD 各國若透過調降或取消遺產與贈與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稅，是否會創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亦或者是否構成一種「租稅競爭」工具，而促進外國資本的長期進入與設點行為，並進一步增強該國在全球資本市場中的競爭力。因此，本文嘗試應用現今廣泛被使用的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透過整理 OECD 國家共 38 國之資料，並選取適當的控制變數探討若政府欲以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作為租稅競爭策略時，其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前後對 FDI 的影響是否產生顯著效果，同時也透過相關的檢測進一步驗證廢除遺產及贈與稅的政策效果為何，所得之實證結果將可供財政當局做為未來政策擬定時之參考。此外，為避免混淆外人投資行為與國人資產調度行為，本研究排除「海外資金回流」的分析，僅聚焦於外國來源的直接投資資料，並不納入與資金回流相關的短期財務資產、稅務寬減方案等變項，藉此確保模型針對的是稅制對外人投資決策的長期效果。

參、研究方法與資料

基於前面文獻說明，本文將遺贈稅視為資本課稅體系的一環，其對跨期資本累積與跨國資本配置的影響，構成本研究進行實證檢驗的理論基礎。在方法設計上，本文乃運用合成控制法來評估廢除遺贈稅是否對外人直接投資的流入產生顯著影響，而此方法正是建立於遺贈稅改變投資者有效稅負，並藉由影響其跨期與跨國投資決策而可能作用於 FDI 的理論假設之上。因此，「廢除遺贈稅」不僅是一項單一稅目的取消措施，而是涉及資本稅制結構與政府間租稅競爭策略的制度性轉變。此一政策干預的複雜性在於，其同時改變了資本課稅的時點、稅基與稅負分配，並可能引發投資者對未來稅制預期的調整。是以，本文明確承認此複雜性，並將其納入理論與實證設計之中，以確保研究結果能反映政策干預的多層次影響，而非僅限於單一制度變項的平均效果，本文的研究方法與資料說明如下。

一、合成控制法

為了估計某些事件或政策干預的效果，國內外許多研究開始以近年來由 Abadie and Gardeazabal (2003)及 Abadie et al. (2010)廣為倡導的新興的合成控制法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SCM) 做為政策實施成效的分析。Lin and Hung (2016)便使用此法針對調查能源服務公司在 13 個發展中國家的總能源使用進行實證，文中證實了 SCM 能夠考慮調查能源服務公司活動在不同國家可能產生的異質性，同時也發現調查能源服務公司在哥倫比亞、加納、肯尼亞和南非產生了顯著的節能效果；而在智利則發現了顯著的能源使用效果。又因為日益嚴重的肥胖問題，墨西哥自 2014 年 1 月起在全國對含糖飲料徵收蘇打稅(soda tax)，Grogger (2017) 也是應用合成控制法以其它未課稅的商品作為控制組來針對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策進行分析比較。

其次，為了比較臺灣與韓國的經濟成長，陳宜廷(2019)針對臺灣在 1991 年之後的經濟成長率序列運用合成控制法進行反事實分析。Huang and Huang (2022)亦運用合成控制法分析隨袋徵收政策對降低總垃圾量的影響效果。由於 2014 年 6 月財政部修正房屋稅條例後，將住家用之非自住稅率由 1.2%~2%提高為 1.5%~3.6%，並授權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率。所以許義忠等(2022)整理臺灣地區自 2002 年至 2018 年止共 17 年各縣市之資料，並採用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去模擬合成臺北市、桃園市及宜蘭縣於實施囤房稅政策期間內，若無實施囤房稅政策之反事實數據，再與現實中受囤房稅政策影響之實際數據做分析比較。此外，羅時萬等(2024)亦是利用 SCM，以台灣兩稅合一制度相較於 OECD 國家作為準實驗進行分析。

Abadie et al. (2010) 曾指出合成控制法有三大優點：首先，它採用資料驅動程序，減少選擇控制單位的主觀性，通過多個單位的組合提供更好的比較效果。其次，相較於傳統迴歸方法，合成控制法對控制單位進行加權平均，明確顯示每個控制單位的相對貢獻以及預測數據前後的相似程度。最後，它不依賴干預後的結果，允許研究人員在不知影響因素的情況下設計研究。是故，本文參考 Abadie et al. (2010)、Lin and Hung (2016)、Becker et al. (2021)、Abadie (2021) 以及許義忠等(2022)之研究，可架構合成控制法的模型如下[1]。假設觀察 J+1 個國家，i=1,…,J+1，若 i=1 代表在 OECD 國家中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國家(例如：義大利、葡萄牙等 8 國)，其他做為合成組的國家則有 J 個，即 i=2,…,J+1。觀察時間為 T 期，t=1,…,T，在 T_0 期以前表示尚未廢除遺產及贈與稅，而廢除遺產及贈與稅的時期為 T_0+1 至 T 期，1≤ T_0<T。

假設第 i 國在 t 期受到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干預 FDI 之效果為 $\alpha_{it} = Y_{it}^{I} - Y_{it}^{N}$。$Y_{it}^{I}$ 代表國家 i 在 t 期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之 FDI，Y_{it}^{N} 則是國家 i 若在 t 期沒有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下的 FDI。因為 Y_{it}^{I} 是實際上已可觀察到的資料，因此我們只需要估計出 Y_{it}^{N}，即可知道廢除遺產及贈與稅的干預效果 α_{it}。假設 Y_{it}^{N} 如下：

$$Y_{it}^{N} = \delta_t + \theta_t Z_{it} + \lambda_t \mu_i + \varepsilon_{it} \tag{1}$$

δ_t 是一個存在於所有國家而未知的共同因素，θ_t 為一特定時間參數矩陣，Z_{it} 係可觀察到而不受政策影響的自變數矩陣，λ_t 是無法觀察到的共同因子，μ_i 為未知的因素，殘差項 ε_{it} 是平均值為零而且無法觀察到的短期衝擊。

其次，我們假設第 1 個國家(i=1)為廢除遺產及贈與稅的實驗組國家，其它

[1] 連昱羽等(2024)文中亦指出，當各國共同面對混雜因素，例如全球景氣循環、外生事件等，合成控制法乃是更能緩解混雜因素對實證結果所造成的偏誤。

臺灣期刊論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J 個沒有廢除遺產及贈與稅的國家(j=2,…,J+1)令為合成組，用以加權計算來模擬合成實驗組未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下的假想結果。權重 W 為一個(J×1)的矩陣，$W=(W_2,\ldots,W_{J+1})$，$W_j \geq 0$，j=2,…,J+1，且 $\sum_{j=2}^{J+1} W_j = 1$。若在 $t \leq T_0$ 時(遺產及贈與稅未廢除前的時期)，我們能求出一組 W_j^*，使合成組國家的 FDI 在加權計算後與實驗組的數據十分相似，也就是：

$$\sum_{j=2}^{J+1} W_j^* Y_{jt} = Y_{1t} \tag{2}$$

$$\sum_{j=2}^{J+1} W_j^* Z_j = Z_1 \tag{3}$$

此時，我們就能利用 $\sum_{j=2}^{J+1} W_j^* Y_{jt}$ 及 $t > T_0$ 的資料，去模擬合成實驗組國家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時點後若未廢除遺產及贈與稅的假想數據，也因此可以求出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干預效果如下：

$$\hat{\alpha}_{1t} = Y_{1t} - \sum_{j=2}^{J+1} W_j^* Y_{jt}, \text{ 且} t > T_0 \tag{4}$$

實際上，最適權重 W_j^* 是透過資料驅動方式求出，使實驗組與合成組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前之特性矩陣的差距最小、最接近。也就是最適權重 W_j^* 要使下式的差距數最小：

$$\left\| X_1 - X_0 W \right\|_V = \sqrt{(X_1 - X_0 W)' V (X_1 - X_0 W)} \tag{5}$$

X_1 是(k×1)矩陣，係實驗組國家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前之屬性資料；X_0 則為(k×J)矩陣，代表合成組國家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前的屬性資料；V 是一個(k×k)的對稱且半正定(semidefinite)矩陣。簡單的說，合成控制法就是利用資料驅動方式去求出一組最適權重來，使合成組國家經過加權計算後，其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前之數據和特性會與實驗組國家十分相似，再進一步用以估計實驗組國家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所無法觀察到的反事實數據，因而求出其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政策影響效果。

依據陳宜廷(2019)文中指出 ，我們可將合成控制法視為比較研究的延伸，但卻不同於傳統的比較研究，它並不侷限於以單一國家做為反事實分析中的控制單位，而是先由不同國家所構成的一組潛在控制單位，再透過實驗組國家與這些國家的資料媒合 (matching)，以最適凸組合(optimal convex combination)方式得出最接近實驗組國家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前數據特性的合成控制單位。

但是，因為合成控制法的樣本數少，不能用一般統計檢測方法去檢驗統計結果的顯著性，所以 Abadie et al. (2010)便提出採用安慰劑檢測法(placebo test)來檢驗其統計結果之顯著性。安慰劑檢測法就是如同醫學上的安慰劑試驗一樣，將沒有廢除遺產及贈與稅的國家，假設它們採行了如同安慰劑效果的政策，將其依序採用合成控制法去計算其各自的實驗組與合成組之差距數，然後再與真

臺灣大學圖書館

正有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國家之實驗組與合成組差距數去做比較，若採行安慰劑國家之差距數與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國家之差距數相似或差異不大，甚或 FDI 下跌差距遠大於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國家，則代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影響 FDI 之效果不顯著，反之則為有顯著影響 FDI 效果。

二、樣本選取及變數說明

(一) 樣本選取

考量經濟體規模及特性，以及去除無法控制之變異，並為了確保模擬合成後之數據能具有代表性，故本研究採用 36 個 OECD 國家為研究對象，並以 2000 年後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 8 個國家為實驗組，其餘 28 個 OECD 國家為控制組，從世界發展指標資料庫(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獲得這些國家之相關經濟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表 1 列出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實驗組國家及其廢除年度與研究期間，表 2 列出未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控制組國家，同時也以地圖方式標示出實驗組及控制組國家之地理位置，如圖 2 所示。

表 1　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 OECD 國家

國家	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年度	研究期間
義大利(Italy)*	2001	1994~2005
葡萄牙(Portugal)	2004	1994~2018
斯洛伐克(Slovakia)	2004	1994~2018
瑞典(Sweden)	2005	1994~2018
匈牙利(Hungary)	2006	1994~2018
奧地利(Austria)	2008	1994~2018
捷克(Czech)	2014	1994~2018
挪威(Norway)	2014	1994~2018

*義大利曾於 2001 年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但於 2006 年恢復課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2　未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 OECD 國家

國家	國家
智利(Chile)	土耳其(Turkey)
日本(Japan)	加拿大(Canada)
韓國(Korea)	墨西哥(Mexico)
法國(France)	比利時(Belgium)
波蘭(Poland)	拉脫維亞(Latvia)
希臘(Greece)	瑞士(Switzerland)
冰島(Iceland)	荷蘭(Netherlands)
芬蘭(Finland)	立陶宛(Lithuania)
西班牙(Spain)	愛沙尼亞(Estonia)
以色列(Israel)	美國(United States)
澳洲(Australia)	盧森堡(Luxembourg)
丹麥(Denmark)	紐西蘭(New Zealand)
德國(Germany)	斯洛凡尼亞(Slovenia)
愛爾蘭(Ireland)	英國(United Kingdom)

註：OECD 截至 2020 年共有 37 國，但本研究期間僅至 2018 年，故研究樣本僅包含截至 2018 年共 36 個國家，不包含 2020 年加入 OECD 之哥倫比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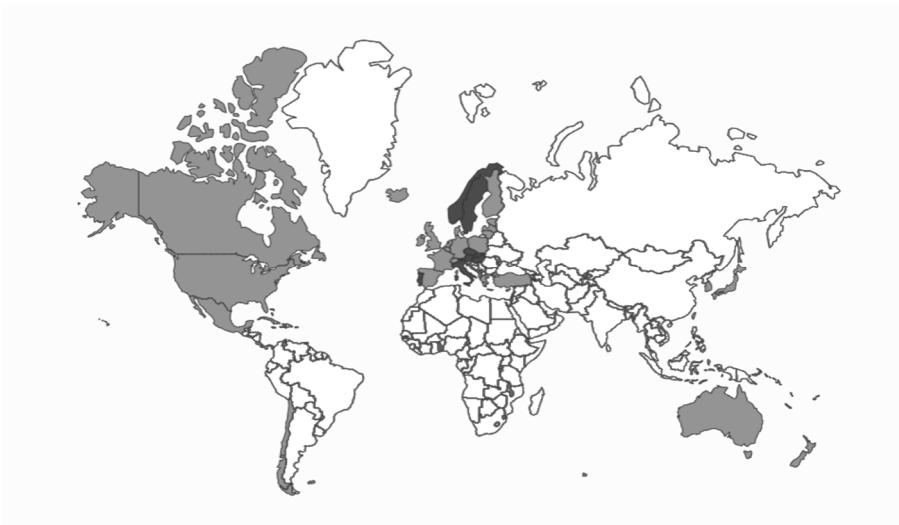


圖 2 實驗組(黑色)與控制組(灰色)國家地理位置分布圖

(二) 變數說明

本文所使用之變數皆來自世界發展指標資料庫(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以下將對實證中所使用之變數，依序進行說明。

1. 外人直接投資 *FDI*：以該國外人直接投資流入淨額除以該國 GDP 的百分比衡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租稅負擔 *TAXBURDEN*：以該國稅收收入占當年度 GDP 的百分比衡量。
3. 貿易開放程度 *OPEN*：該國貿易總額(進口額+出口額)占當年度 GDP 的百分比衡量。
4. 政府規模 *GOV*：以該國政府最終消費支出佔當年度 GDP 的百分比衡量。
5. 教育資本支出 *EDU*：以該國教育支出占國民總收入的百分比衡量。
6. 健康資本支出 *HEP*：以該國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衡量。
7. 勞動力參與率 *LFPRT*：以該國 15 歲以上之民間人口中有參與勞動的百分比衡量。
8. 人口密度 *POPD*：以該國每一平方公里之人口數再取自然對數衡量，代表都市化程度及市場規模。

(三) 敘述統計量

表 3.1 至表 3.2 分別為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之 8 個實驗組國家、未實施此政策之控制組 28 個國家，以及全部 OECD 國家之敘述性統計資料。研究期間為了避免 2019 年 COVID-19 所可能帶來的複雜影響，因此樣本期間只涵蓋 1994 年至 2018 年共 25 年，其中義大利因於 2001 年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並於 2006 年恢復課徵，為確保研究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政策效果不受影響，故義大利之研究期間僅為 1994~2005 年，共 12 年。

由表 3.1 中可以發現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 8 個國家中，除了匈牙利之外，其餘國家調整前 FDI 皆低於控制組國家之平均，由此可知這些國家將更有誘因透過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來吸引更多外資流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3.1　敘述統計-實驗組國家

國家	變數名稱 (單位)	外人直接投資 *FDI*(%)		租稅負擔 *TAXBURDEN*	開放程度 *OPEN*	政府規模 *GOV*	教育資本支出 *EDU*	健康資本支出 *HEP*	勞動力參與率 *LFPRT*	人口密度 *POPD*
	統計量	調整前	調整後	(%)	(%)	(%)	(%)	(%)	(%)	(人口/km2)
葡萄牙	平均數	3.528	-7.813	20.940	69.096	18.868	4.972	6.156	60.232	113.208
	標準差	2.438	2.983	1.104	8.527	1.299	0. 320	0.316	1.545	1.960
	最小值	0.400	-13.421	19.100	57.200	16.900	4.300	5.900	57.700	109.200
	最大值	9.900	-1.921	22.800	87.000	21.3000	5.500	6.900	62.200	115.400
斯洛伐克	平均數	3.668	-7.673	18.180	145.728	20.016	3.784	5.080	59.560	112.116
	標準差	2.984	2.963	2.171	31.360	2.259	0.225	0.382	0.458	0.541
	最小值	-0.400	-12.321	15.200	97.500	17.100	3.400	4.700	58.800	111.200
	最大值	12.000	1.246	23.200	190.400	25.300	4.200	5.800	60.500	113.300
瑞典	平均數	4.612	-6.729	27.200	80.300	25.424	6.896	7.436	66.260	22.580
	標準差	4.930	4.789	2.799	7.280	0.644	0.709	1.245	4.770	1.121
	最小值	-1.500	-12.982	14.800	63.800	24.100	5.700	6.300	60.200	21.400
	最大值	23.000	10.232	30.300	92.600	26.400	8.300	9.300	73.000	25.000
匈牙利	平均數	8.564	-2.777	22.164	135.432	21.340	4.740	4.896	51.176	111.840
	標準差	19.992	18.970	1.254	32.533	1.281	0.439	0.312	2.600	2.381
	最小值	-41.500	-48.007	19.900	56.500	19.700	4.100	4.600	47.600	108.000
	最大值	54.600	41.332	24.200	168.500	25.500	5.700	5.700	56.700	115.100

註：表中調整前之數值是呈現未經過去平均化與去趨勢化之原值，而調整後之數值則為進行穩健性分析時，經過去平均化與去趨勢化後的數值。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期刊資料庫

表 3.1　敘述統計-實驗組國家(續)

國家	變數名稱 (單位)	外人直接投資 *FDI*(%)		租稅負擔 *TAXBURDEN*	開放程度 *OPEN*	政府規模 *GOV*	教育資本支出 *EDU*	健康資本支出 *HEP*	勞動力參與率 *LFPRT*	人口密度 *POPD*
	統計量	調整前	調整後	(%)	(%)	(%)	(%)	(%)	(%)	(人口/km2)
奧地利	平均數	2.680	-8.661	25.716	91.460	19.524	5.268	7.108	59.676	100.232
	標準差	6.442	6.453	1.726	13.009	0.479	0.219	0.294	1.109	3.423
	最小值	-7.300	-20.568	18.300	66.000	18.700	4.900	6.800	57.300	96.100
	最大值	25.700	13.079	28.000	107.800	20.700	5.800	7.500	61.400	107.100
捷克	平均數	4.876	-6.465	14.716	117.792	20.184	4.104	5.540	59.692	134.296
	標準差	2.752	2.945	0.785	27.797	0.788	0.721	0.440	0.969	1.873
	最小值	0.900	-13.121	13.400	75.700	19.200	3.300	5.000	58.300	131.900
	最大值	10.400	-0.354	16.800	158.700	22.300	5.700	6.500	61.600	137.700
挪威	平均數	2.300	-9.041	25.380	70.168	21.064	6.488	7.244	70.688	13.012
	標準差	2.342	2.596	2.209	2.386	1.593	0.435	0.901	3.465	0.870
	最小值	-5.100	-18.368	21.700	66.600	18.500	5.800	6.300	63.700	11.900
	最大值	6.200	-6.321	28.900	74.900	24.400	7.600	9.000	74.100	14.500
義大利*	平均數	0.850	-10.349	23.858	46.225	18.233	4.300	5.733	48.258	194.142
	標準差	0.592	2.055	1.210	2.965	0.766	0.165	0.337	0.796	1.249
	最小值	0.200	-13.321	22.000	40.500	17.400	4.000	5.500	47.300	193.300
	最大值	2.000	-4.607	25.800	50.400	19.600	4.500	6.500	49.700	197.100

註：表中調整前之數值是呈現未經過去平均化與去趨勢化之原值，而調整後之數值則為進行穩健性分析時，經過去平均化與去趨勢化後的數值。

*義大利僅統計其研究期間 1994~2005。

臺灣大學會計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3.2　敘述統計-控制組國家與全樣本

國家	變數名稱 (單位) 統計量	外人直接投資 *FDI* (%)	租稅負擔 *TAXBURDEN* (%)	開放程度 *OPEN* (%)	政府規模 *GOV* (%)	教育資本支出 *EDU* (%)	健康資本支出 *HEP* (%)	勞動力參與率 *LFPRT* (%)	人口密度 *POPD* (人口/km2)
控制組國家	平均數	5.041	19.299	87.991	18.507	4.849	5.451	60.767	141.495
	標準差	9.826	6.193	57.102	4.123	1.199	1.785	6.260	142.957
	最小值	-58.300	1.300	16.100	8.100	2.100	2.000	45.500	2.300
	最大值	86.600	37.900	408.400	27.900	8.400	9.200	83.800	529.400
全樣本	平均數	4.788	19.965	89.566	18.987	4.893	5.620	60.483	132.441
	標準差	9.459	5.958	53.443	3.905	1.192	1.690	6.479	129.894
	最小值	-58.300	1.300	16.100	8.100	2.100	2.000	45.500	2.300
	最大值	86.600	37.900	408.400	27.900	8.400	9.300	83.800	529.400

註：本研究自行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節將針對「OECD 國家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外人直接投資之影響」實證結果進行分析。本文所使用之資料為縱橫資料(panel data)，並採用合成控制法(SMC)，參考 Abadie et al. (2010)在政策實施前挑選模擬效果最佳的三個年度模擬反事實數據，進行比較案例分析，為了便於呈現實證結果將依國家於逐一進行說明。

一、共變量平均

表 4 為實驗組國家與控制組模擬合成數據之間的各項變數之比較，並提供其他 28 國家之平均數以供參考。若合成效果佳，理想的結果是，控制組模擬合成之數據相較於其他 28 國家之平均數應更接近於實驗組國家的數據。模型中被解釋變數為 FDI，解釋變數為租稅負擔、貿易開放程度、政府規模、教育資本支出、健康資本支出、勞動力參與率、人口密度，其中人口密度取自然對數，以降低數據之差異性，提高模擬合成效果。為了衡量模擬之精確程度，本文另計算出外人直接投資 FDI 的平均預測誤差平方根(Root Mean Square Predication Error, RESPE)，以估計模擬合成數據與實際數據之貼合程度，該數值越小，代表模擬效果越好。

根據表 4 則可得知，葡萄牙的控制組模擬合成數除了貿易開放程度與人口密度(取自然對數)跟實際數據差異之比例較大外，其餘皆與實際數據相近；斯洛伐克則是除了教育資本支出、政府規模差異比例較大外，其餘皆與實際數據接近；而在瑞典與匈牙利部分，前者除了貿易開放程度而後者除了勞動參與率及人口密度(取自然對數)外，其餘數據相較於其他 28 國之平均皆貼近實驗組之數據。此外，奧地利、捷克、挪威與義大利等四國，則除了義大利的租稅負擔與教育資本支出模擬合成數差異比例較大外，整體而言，模擬合成數據相較於其他 28 個國家之平均更貼近實際數據，故模擬合成數應比其他 28 國之平均對實驗組國家之 FDI 更具代表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4　實驗組國家的共變量平均

變數名稱	變數符號	年	葡萄牙 實際數據	葡萄牙 模擬合成數據	其他 28 個國家平均	年	斯洛伐克 實際數據	斯洛伐克 模擬合成數據	其他 28 個國家平均	年	瑞典 實際數據	瑞典 模擬合成數據	其他 28 個國家平均	年	匈牙利 實際數據	匈牙利 模擬合成數據	其他 28 個國家平均
租稅負擔	*TAXB*		20.3	19.700	19.4		19.900	20.8	19.4		26.800	27.7	19.3		21.700	22.6	19.4
貿易開放程度	*OPEN*		62.3	87.600	76.0		112.000	106.2	76.0		73.900	89.0	76.6		107.000	123.9	77.5
政府規模	*GOV*		18.4	20.900	18.1		22.300	18.0	18.1		25.400	18.2	18.1		22.100	20.5	18.1
教育資本支出	*EDU*		5.0	5.000	4.7		3.800	5.1	4.7		7.300	5.8	4.7		4.900	5.2	4.7
健康資本支出	*HEP*		6.0	5.900	4.9		4.700	5.6	4.9		6.500	5.7	4.9		4.900	5.9	5.0
勞動力參與率	*LFPRT*		60.0	68.100	60.3		59.800	57.8	60.3		63.000	60.5	60.3		49.700	69.7	60.3
人口密度	*POPD*		4.7	2.900	4.2		4.700	4.6	4.2		3.100	3.7	4.2		4.700	2.7	4.2
外人直接投資(1)	*FDI-(1)*	1997	60.6	61.100	61.3	1994	59.600	59.2	60.6	1995	63.900	62.3	60.8	1997	67.100	64.4	61.3
外人直接投資(2)	*FDI-(2)*	1999	58.9	61.100	64.8	1998	60.500	61.0	62.9	1999	81.300	74.8	64.8	2000	64.100	65.3	66.3
外人直接投資(3)	*FDI-(3)*	2003	64.6	63.600	61.8	2002	70.300	68.4	62.8	2002	65.200	65.1	62.8	2005	82.600	76.8	64.6
平均預測誤差平方根	*RMSPE*			1.165			1.438				3.009				2.997		

註：本研究自行計算與整理。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4　實驗組國家的共變量平均(續)

變數名稱	變數符號	年	奧地利 實際數據	奧地利 模擬合成數據	其他 28 個國家平均	年	捷克 實際數據	捷克 模擬合成數據	其他 28 個國家平均	年	挪威* 實際數據	挪威* 模擬合成數據	其他 28 個國家平均	年	義大利 實際數據	義大利 模擬合成數據	其他 28 個國家平均
租稅負擔	*TAXB*		25.7	20.400	19.5		14.700	19.8	19.2		26.000	19.0	19.2		24.700	13.7	19.5
貿易開放程度	*OPEN*		83.2	87.800	79.4		109.000	108.4	84.4		70.300	70.3	84.4		44.800	28.8	74.2
政府規模	*GOV*		19.3	20.600	18.1		20.400	19.5	18.5		20.500	16.3	18.5		17.700	16.6	18.0
教育資本支出	*EDU*		5.3	5.200	4.7		3.800	5.0	4.8		6.500	5.4	4.8		4.400	3.3	4.7
健康資本支出	*HEP*		6.9	5.800	5.0		5.400	5.5	5.3		6.900	5.1	5.3		5.500	5.5	4.8
勞動力參與率	*LFPRT*		58.8	69.700	60.4		59.600	59.5	60.6		72.300	64.4	60.6		47.700	59.8	60.3
人口密度	*POPD*		4.6	3.000	4.2		4.900	4.5	4.2		2.500	3.5	4.2		5.300	5.4	4.2
外人直接投資(1)	*FDI-(1)*	2002	58.4	60.600	62.8	1999	68.000	65.4	64.8	1997	61.100	61.3	61.3		58.600	58.7	61.3
外人直接投資(2)	*FDI-(2)*	2005	84.0	74.000	64.6	2002	68.700	65.2	62.8	2000	63.200	63.3	66.3		58.900	59.0	64.8
外人直接投資(3)	*FDI-(3)*	2007	76.0	76.300	66.2	2006	62.900	63.7	68.2	2006	61.700	63.7	68.2		59.500	59.6	66.3
外人直接投資(4)	*FDI-(4)*									2007	64.500	64.8	66.2				
外人直接投資(5)	*FDI-(5)*									2012	63.800	62.5	63.8				
外人直接投資(6)	*FDI-(6)*									2013	58.000	58.2	62.7				
平均預測誤差平方根	*RMSPE*			4.165			1.880				1.045				0.046		

註：本研究自行計算與整理。

*：本文依據 Abadie et al. (2010)方法採用 3 個年度進行模擬，進行挪威模擬合成數據時發現，有兩組完全不重複的 3 個年度模擬出來的 RESPE 都特別低，故將此兩組共 6 個年度合併進行模擬後，研究結果發現其 RMSPE 更低(即模擬效果更佳)，故模擬挪威合成數據時採 6 個年度進行。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另外透過表 5 之實驗組國家合成權重數，可以求得模擬合成之葡萄牙、斯洛伐克、瑞典、匈牙利、奧地利、捷克、挪威與義大利。以葡萄牙為例，根據表 5 所示，納入模擬葡萄牙之合成國家有希臘(權重 0.102)、冰島(權重 0.403)、德國(權重 0.156)以及愛沙尼亞(權重 0.339)，將 8 個實驗組國家之合成模擬可以下列式子表示：

合成的葡萄牙=希臘×0.102+冰島 0.403+德國×0.156+愛沙尼亞×0.339

合成的斯洛伐克=德國×0.051+荷蘭×0.018+愛爾蘭×0.171+斯洛凡尼亞×0.76

合成的瑞典=愛爾蘭×0.094+比利時 0.298+紐西蘭 0.608

合成的匈牙利=冰島×0.491+荷蘭×0.036+盧森堡×0.202+愛沙尼亞×0.271

合成的奧地利=日本×0.169+冰島×0.395+丹麥×0.06+愛沙尼亞×0.376

合成的捷克=日本×0.145+丹麥×0.063+愛爾蘭×0.113+比利時 0.048+
立陶宛×0.228+愛沙尼亞×0.142+斯洛凡尼亞×0.261

合成的挪威=智利×0.116+芬蘭×0.239+瑞士×0.244+美國×0.104+
盧森堡×0.003+紐西蘭×295

合成的義大利=日本×0.629+希臘×0.197+澳洲×0.018+德國×0.056+
以色列×0.045+土耳其×0.0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5　按地區分之實驗組與控制組國家

實驗組國家	控制組國家		
	歐洲地區		非歐洲地區
義大利(Italy)	法國(France)	比利時(Belgium)	智利(Chile)
葡萄牙(Portugal)	波蘭(Poland)	拉脫維亞(Latvia)	日本(Japan)
斯洛伐克(Slovakia)	希臘(Greece)	瑞士(Switzerland)	韓國(Korea)
瑞典(Sweden)	冰島(Iceland)	荷蘭(Netherlands)	以色列(Israel)
匈牙利(Hungary)	芬蘭(Finland)	立陶宛(Lithuania)	澳洲(Australia)
奧地利(Austria)	西班牙(Spain)	愛沙尼亞(Estonia)	加拿大(Canada)
捷克(Czech)	丹麥(Denmark)	盧森堡(Luxembourg)	墨西哥(Mexico)
挪威(Norway)	德國(Germany)	斯洛凡尼亞(Slovenia)	美國(United States)
	愛爾蘭(Ireland)	英國(United Kingdom)	紐西蘭(New Zealand)
	土耳其(Turkey)		
共 8 國	共 19 國		共 9 國

上面合成控制法所產生的權重具體而言，代表了各潛在控制國在構建「未廢除遺贈稅」之反事實情境時的貢獻比重。方法上，權重係透過最小化政策干預前期間各解釋變數的均方誤差而求得，使合成控制體在干預前的經濟結構與實驗組國家最為接近。以葡萄牙為例，其合成對照國由希臘(0.102)、冰島(0.403)、德國(0.156)與愛沙尼亞(0.339)加權構成，代表這些國家在政策干預前的經濟特徵最能共同重現葡萄牙的發展軌跡。換言之，權重愈高的國家，其在政策前期間的稅制結構、投資行為與 FDI 流入趨勢愈與受試國相似，因而在反事實建構中貢獻愈大；反之，權重為零的國家則表示其經濟結構與研究對象差異顯著，未被納入合成控制體。

此外，在經濟意涵上， SCM 的權重不僅是統計意義上的加權係數，更可視為反映「政策相似性」與「經濟結構可比性」的量化指標。不同國家權重組合的差異，揭示了租稅競爭策略與 FDI 反應在 OECD 國家間的結構異質性。若權重集中於少數國家，表示實驗組國家具有較特殊的稅制或投資結構；若權重分散，則顯示其經濟行為更接近 OECD 平均模式。

二、趨勢圖分析

圖 3 檢視 8 個實驗組國家其外人直接投資(FDI)與 OECD 控制組國家平均外人直接投資之各年度趨勢。就葡萄牙而言，垂直虛線為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實施年度(2004)，由圖可知，政策實施前葡萄牙 FDI 幾乎低於平均值，因此藉由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吸引外資投入，似有其必要，但 2004 年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後，除 2012 年 FDI 明顯高於其他年度外，其餘年度波動不大幾乎呈現持平現象，顯示政策可能未達預期之效果。就斯洛伐克而言，政策實施前斯洛伐克 FDI 除了 2002 年外大多低於平均值，但 2004 年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實施後，即便 2004 年加入歐盟、2009 年加入歐元區，但多數年度之 FDI 仍低於平均值，且呈現下降趨勢，顯示政策可能未達預期之效果。

再者，就瑞典而言，垂直虛線為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實施年度(2005)，因此由

臺灣大學會計研究資訊

圖 3 可看出政策實施前除 1999 年外，其餘 FDI 呈現平穩走勢，但 2004 年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後卻呈現下降趨勢，顯示政策可能未達預期之效果。而在匈牙利部分，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的實施年度為 2006 年，但政策實施前匈牙利 FDI 波動不大，反而自 2004 年加入歐盟後呈現上升趨勢，且於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實施後達到最高點，不過自 2008 年後則呈現停滯，甚至衰退。另外，在奧地利的部分，其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之實施年度為 2008 年，故可看出在政策實施前除了 2005 年與 2007 年外，其餘 FDI 皆低於 OECD 控制組國家之平均，但是當 2008 年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後則呈現下降趨勢，顯示政策初期可能未達預期之效果，直至 2017 年奧地利之 FDI 才略高於 OECD 控制組國家之平均。在捷克部分，於 2014 年才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同樣由圖 3 可知捷克的 FDI 自 2005 年起呈現下降之趨勢，顯示政府雖然希望藉由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吸引外資投入，但自 2014 年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後，並未有顯著的提升。

最後在挪威與義大利部分，兩國分別於 2014 年及 2001 年廢除遺產及贈與稅，然而挪威的外人直接投資(FDI)自 2007 年起便呈現下降之趨勢，即便 2014 年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後，仍維持下滑趨勢，顯示政策並未能達預期之效果。而義大利由於在 2006 年恢復課徵遺產及贈與稅，為了確保研究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政策效果不受影響，故義大利的研究期間將取至 2005 年為止。而同樣根據圖 3 顯示，義大利外人直接投資(FDI)均低於 OECD 控制組國家之平均值，雖然政府希望透過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促進外資流入，但政策實施後義大利外人直接投資(FDI)並無太大起伏，仍呈現平穩走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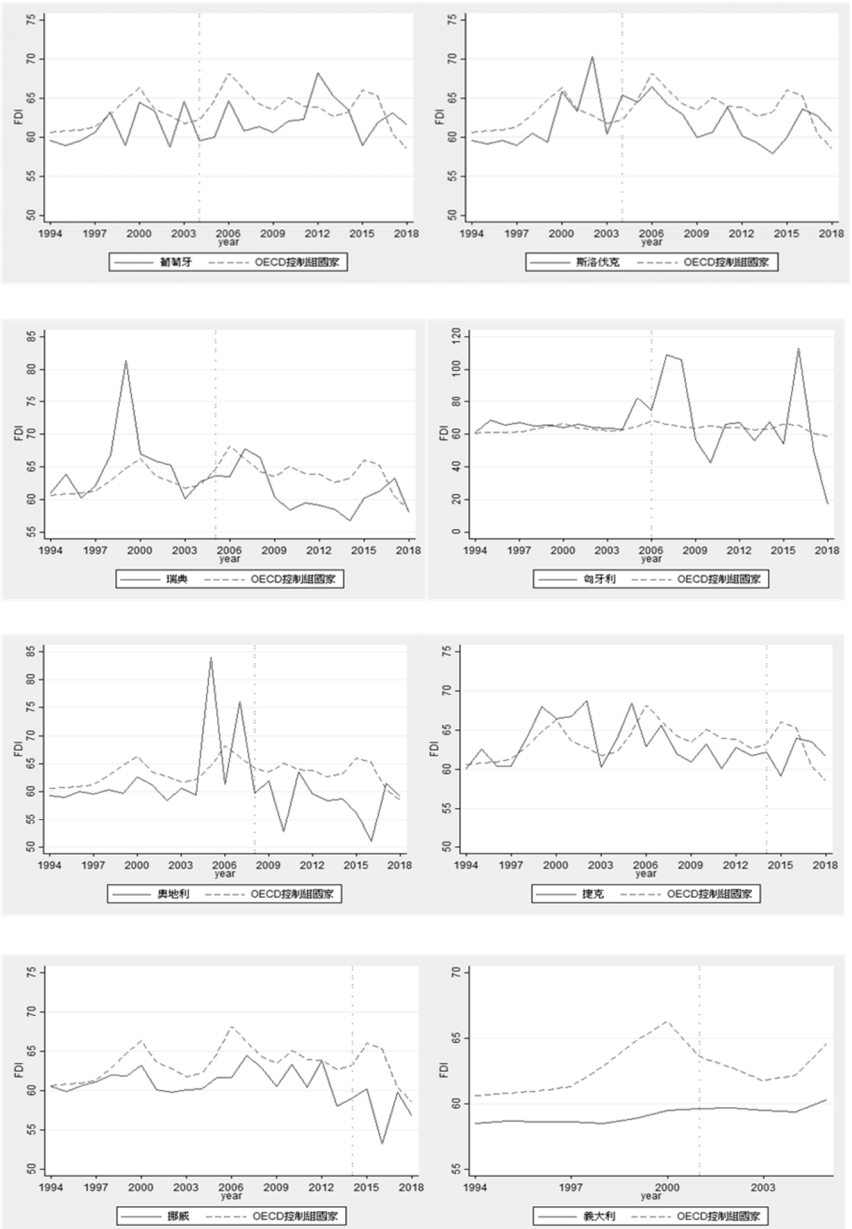


圖 3 實驗組國家與控制組國家 FDI 趨勢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實驗組與模擬實驗組之 FDI 差異分析

為了檢視本文的模擬效果是否良好，將以 OECD 控制組國家所模擬合成之數據在圖 4 中之虛線表示，其意涵即代表若實驗組國家在沒有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下的外人直接投資(FDI)之模擬結果，而垂直虛線則代各國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之年度，倘若政策實施前實驗組與合成組兩條線愈貼合，表示模擬效果越好。另外，原來的實驗組國家之數據則以實線表示。就葡萄牙而言，如圖 4 所示，政策實施前實線與虛線貼近，代表模擬效果佳，具有極高參考價值。而 2004 年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後，葡萄牙之 FDI 大多介於 60 至 65 之間，且在 2011 年以前實際 FDI 皆低於模擬合成之數據，表示短期內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似乎無法吸引更多外資投入，亦即政策的短期效果不佳，但 2012 年後則高於模擬合成之數據，顯示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於 FDI 長期仍具有正向影響。在斯洛伐克方面，除了 2002 年外大多低於平均值，但 2004 年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實施後，即便 2004 年加入歐盟、2009 年加入歐元區，但多數年度之 FDI 仍低於平均值，且呈現下降趨勢，顯示政策可能未達預期之效果。

其次，在瑞典部分，政策實施前除了 1999 與 2001 年外，其餘年度實線與虛線十分貼近，代表模擬效果佳。然而 2004 年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後，不但實際 FDI 大多低於模擬合成之數據，且呈現下降趨勢，顯示此項政策似乎無法吸引更多外資投入，代表瑞典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吸引海外資金之效果不佳。而匈牙利於 2006 年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後，初期實際 FDI 皆大幅高於模擬合成之數據，代表短期廢除遺贈稅對於 FDI 具有正向影響；但中長期而言，除了 2016 年 FDI 大幅高於模擬合成之數據外，其餘年度皆低於合成組 FDI，亦顯示廢除遺產及贈與稅長期對 FDI 之政策效果不佳。奧地利則是在 2008 年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後，實際 FDI 大多低於模擬合成之數據，代表倘若恢復未實施廢除遺贈稅政策，反而能吸引更多外資投入，換言之，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 FDI 流入之政策效果不佳。另外，捷克在 2014 年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後，實際 FDI 大幅低於模擬合成數，但自實施政策第三年開始後則皆略高於模擬合成之數據，顯示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 FDI 流入之政策效果有待後續觀察。

最後，挪威於 2014 年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後，實際 FDI 大多低於模擬合成之數據，代表倘若未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能吸引較多外資投入，反而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並未吸引更多外資投入，亦即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 FDI 流入之政策效果不佳。而義大利在 2001 年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後，義大利實際 FDI 呈現微幅上升趨勢，且皆高於模擬合成之數據，顯示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於 FDI 流入具有正向影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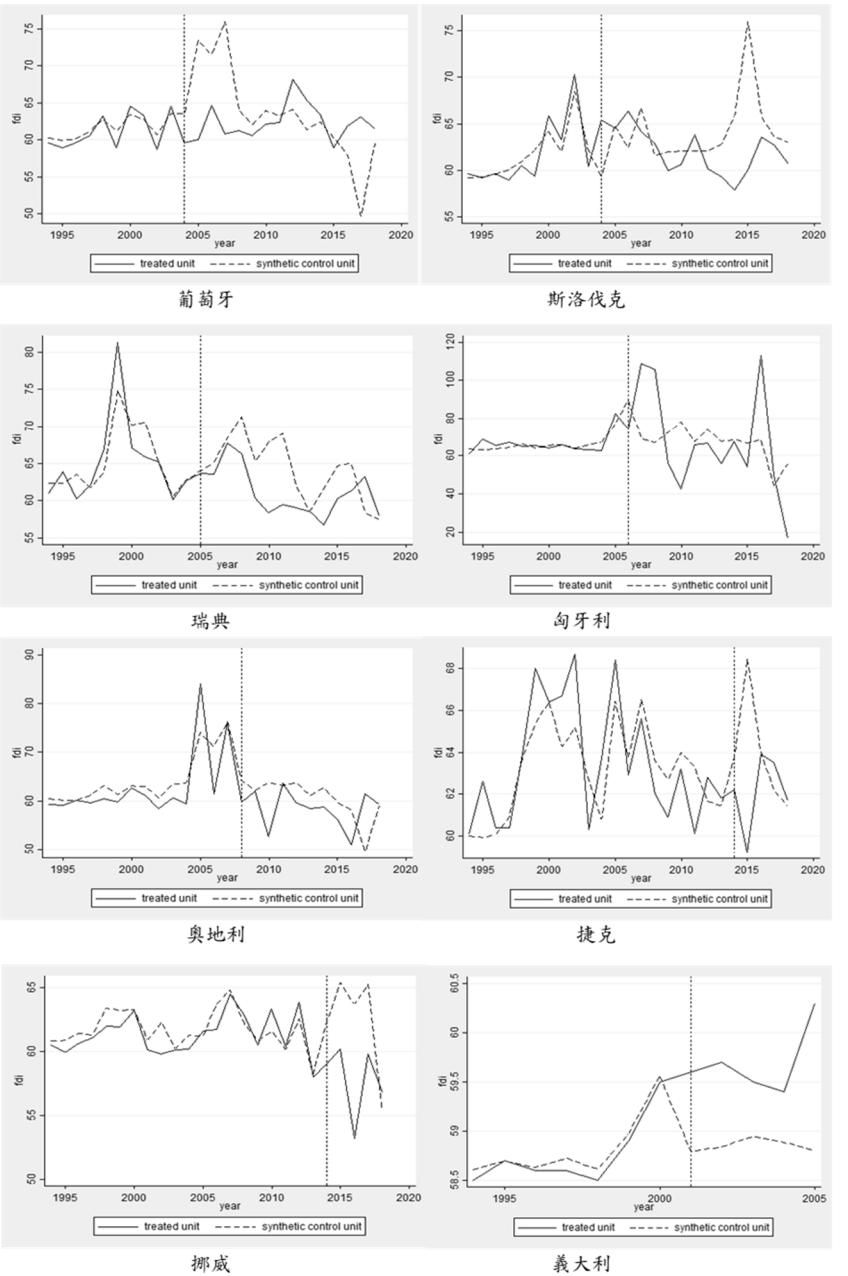


圖 4 實驗組國家與模擬實驗組國家之 FD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全文

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實驗組國家(例如瑞典與奧地利)，其政策實施前期間的實際 FDI 流入軌跡與合成對照體之間並非完全重疊，顯示前期配適度略有差距。此現象可能反映各國在特定年份的短期外生波動(如金融市場流動性、特定產業投資週期)未能完全由控制變數捕捉。儘管如此，整體樣本的配適度衡量指標(RMSE)仍屬可接受範圍，且在下節安慰劑測試中，多數控制國的估計效果均顯著低於實驗組國家，顯示主要研究結果並非配適誤差所致。換言之，雖然個別國家在干預前軌跡存在輕微偏差，整體趨勢仍支持遺贈稅廢除與 FDI 變化之間的關聯性推論。

再者，為了更清楚呈現實驗組國家與 OECD 控制組國家所模擬合成之數據兩者間的差距，亦可由圖 5 的差異圖觀之。葡萄牙自政策於 2004 年實施後，短期外資流入效果不佳，故圖 5 中的線圖短期均為負數，直自 2012 年起才略有起色，雖然葡萄牙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亦實施配套措施改由 10%的印花稅(stamp tax)取代，但前者為財產稅，是以擁有財產者為對象所徵之稅收，課稅標的一般可分為不動產以及動產兩大類；後者是針對契約、憑證、帳簿及權利許可證等文件徵收的稅種，兩者租稅性質不同，換言之，實施配套措施(課徵 10%印花稅)對廢除遺產及贈與稅的稅改效果不會產生重大影響，故短期外資卻仍無明顯成長，顯示想透過單一政策做為租稅競爭來吸引更多外資投入，需花更多時間反應，或應有其他政策配合。斯洛伐克亦於 2004 年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其差異圖短期均為正數，代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 FDI 流入有正向效果，中長期則較為不明顯，特別在 2015 年時差異圖更是快速下降，推究其主因可能是仍保有不動產稅(local real property tax / real estate tax)，由地方政府(municipalities)徵收，以及占模擬權重 17.1%之愛爾蘭當年 FDI 大幅成長之影響所致，顯見斯洛伐克若採取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做為租稅競爭來吸引外資，長期而言可能需要更多配套措施，作為刺激之因素。

另外，瑞典則於 2005 年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其差異圖大多呈現負數，推究其原因為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瑞典政府並實施對繼承與贈與財產之成本與獲取價值課 30%的資本利得稅，所以使外資怯步，反而將資金轉往歐洲其他國家，因此造成原政策效果不佳。而匈牙利則是於 2006 年廢除直系親屬及近親需課遺贈稅之規定，然根據朱澤民等(2016)之研究報告中指出，若無親屬關係，仍需課 18%繼承稅。是故，匈牙利初期實際數與合成數之差距為正，顯示外資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確實有大幅流入，代表此項租稅競爭的政策效果頗佳，然而中後期實際數與合成數之差距為負，可能是因應企業資金調度影響，FDI 未流入匈牙利，故顯示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 FDI 之政策效果不如預期。再者，奧地利於 2008 年雖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政策，不過外資流入效果不佳，實際 FDI 與合成組差異數大多呈現負數，推究其原因則可能為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奧地利政府並實施對無償移轉(贈與及繼承)不動產課 2%或 3.5%的不動產移轉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論文檔

稅之配套措施，因此配套措施之效果可能大幅抵銷過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政策，造成外資流入反而是下降的。

最後，捷克於 2014 年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廢除後之首年 FDI 仍持續下滑，且實際數與合成組之差異數大幅為負，推測可能是受到其將遺產及贈與稅併入所得稅之配套措施所影響，直到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第三年起才略高於模擬之數據，故值得觀察其後續政策效果。而挪威則可能有仿照其他國家試圖透過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做為租稅競爭手段來吸引外資，因其 FDI 自 2007 年起呈現下滑之狀態，如圖 5 所示，挪威於 2014 年才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但外資流入效果不佳，實際 FDI 與合成組差異數亦大多呈現負數，推究其原因可能為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挪威政府同時實施對受益者課徵淨財富稅之配套措施，因此配套措施之效果可能大幅抵銷了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政策，因而阻礙外資流入之動力。義大利在 2001 年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其差異圖短期均為正數，代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 FDI 流入短期具正向影響，長期則受限於研究期間之限制，故無法確切得知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 FDI 流入之長期政策效果[2]。為了更明瞭各國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之相關配套措施，本文整理如表 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義大利又於 2006 年恢復課徵遺產及贈與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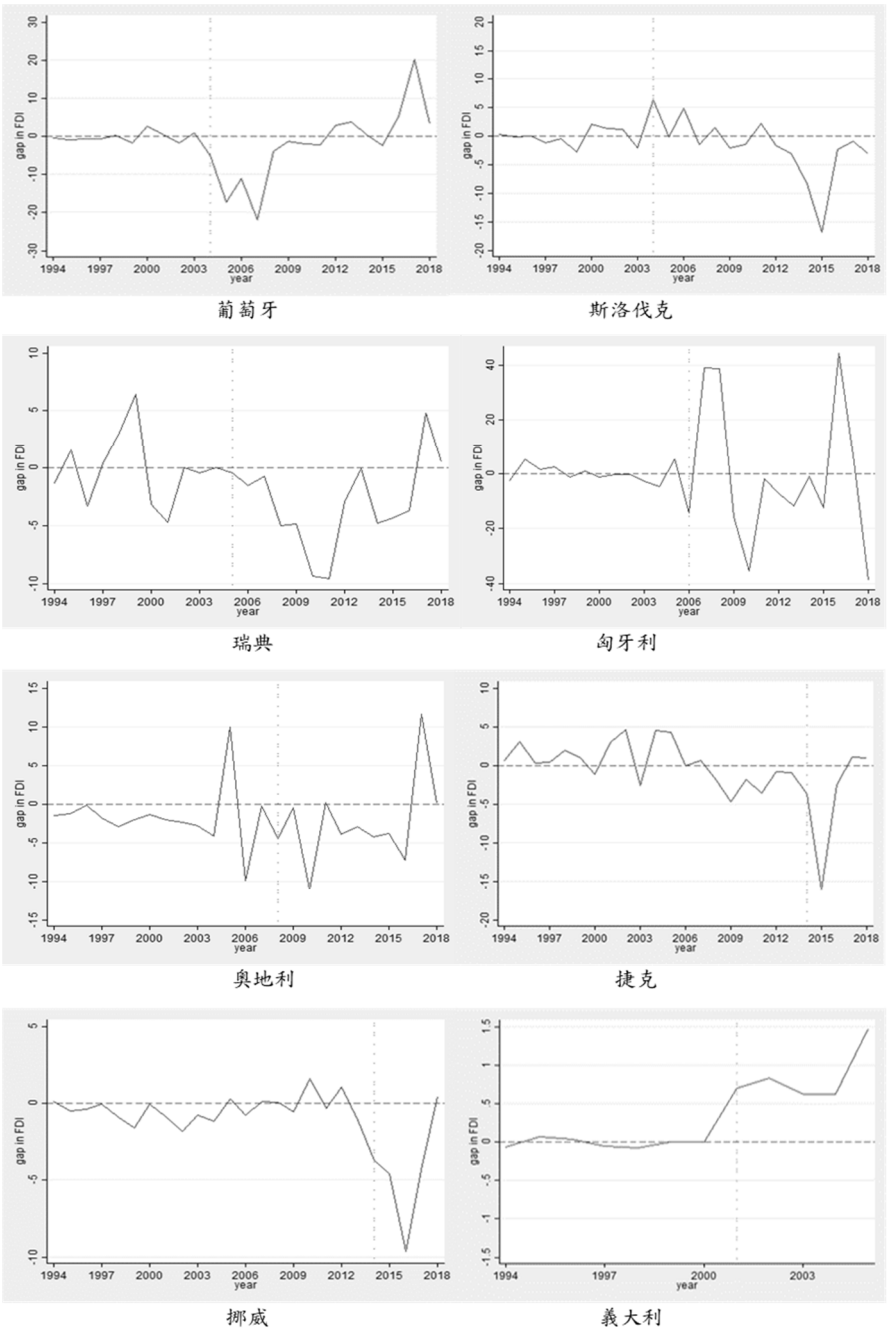


圖 5 模擬實驗組國家之 FDI 差異圖

臺灣

表 6　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之相關配套措施

國家	廢除年度	主要配套稅改措施	本文實證發現
義大利	2001	於 2001 年廢除後又於 2006 年恢復課徵	短期效果佳、長期無法驗證
葡萄牙	2004	印花稅對於大部分受贈或繼承者採 10%的固定稅率，而房地產轉移(不動產)在部分情況下還須額外徵收 0.8%的稅率	短期效果不佳
斯洛伐克	2004	仍保有不動產稅(local real property tax / real estate tax)，由地方政府徵收。此為「持有稅」性質的財產稅，與交易稅或遺贈稅屬不同形式	中長期效果不明顯
瑞典	2005	對繼承與贈與財產之成本與獲取價值課 30%的資本利得稅	長期效果顯著為負
匈牙利	2006	在繼承關係、財產類型、受贈或繼承人身份上設置廣泛豁免	短期效果佳；長期效果不如預期
奧地利	2008	對無償移轉(包括贈與及繼承)不動產課 2%或 3.5%的不動產移轉稅	短、長期效果不佳
捷克	2014	將遺產及贈與稅併入所得稅	效果不明確
挪威	2014	對受益者課徵淨財富稅	短、長期效果不佳

註：本文自行整理。

四、安慰劑測試

為了檢驗實驗組與控制組間效果的顯著性，本研究針對 OECD 控制組國家進行安慰劑(placebo)測試，亦即將沒有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 OECD 控制組國家，進行合成控制法之模擬，視為實施安慰劑的政策效果，再與實驗組國家進行比較。如圖 6 中紅色粗線即為實驗組國家之 FDI 實際值與模擬值之差異數，其餘各條細線乃為 OECD 控制組國家 FDI 實際值與模擬值之差異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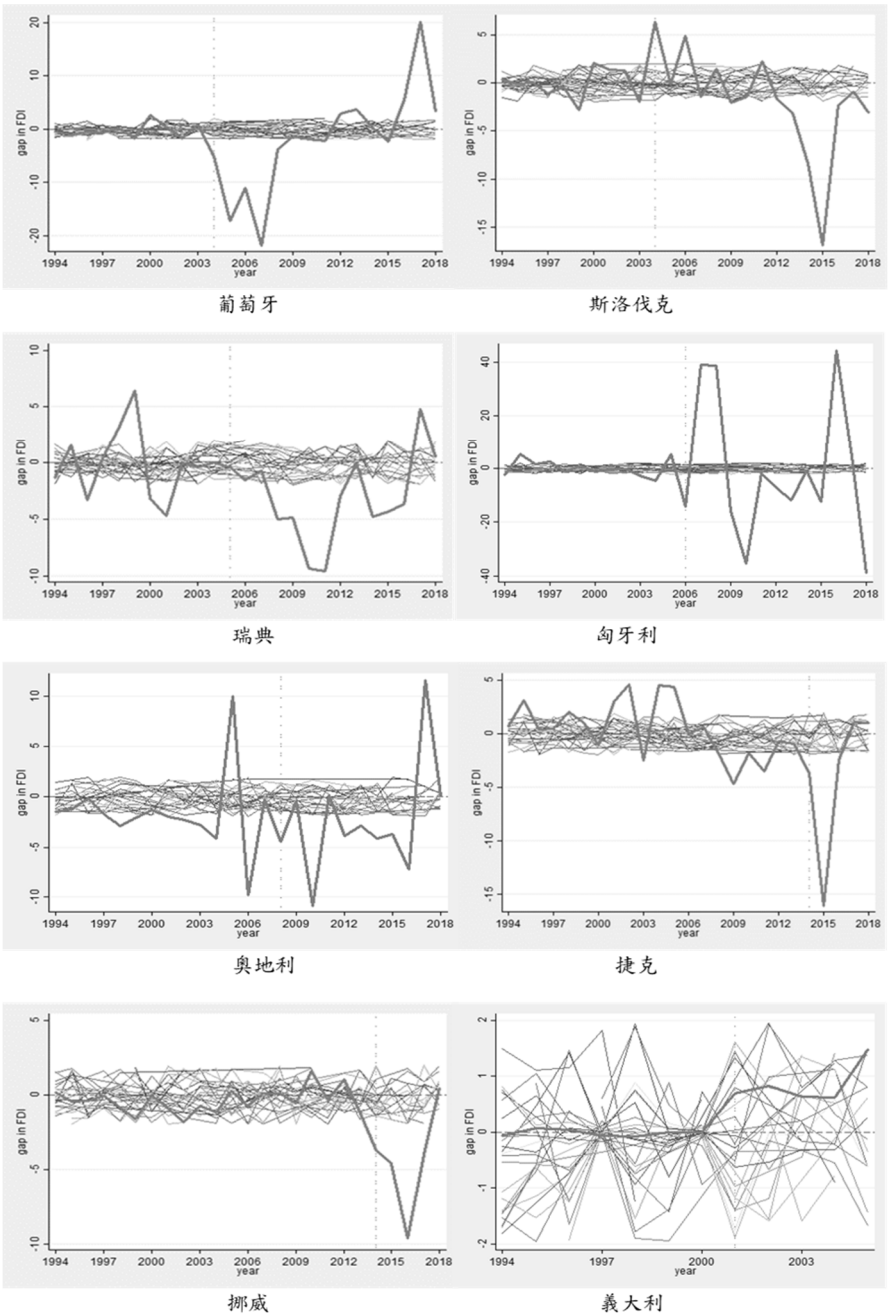


圖 6 安慰劑測試-所有控制組國家

臺灣

若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對 FDI 的流入為顯著正向，則自政策實施年度以後實驗組國家之 FDI 線圖，應呈現上升趨勢，而其他安慰劑檢驗的國家應為隨機而非上升趨勢。另外，需考量安慰劑效果檢測國家之平均預測誤差方平根(Root Mean Square Prediction Error, RMSPE)，亦即模擬效果之好壞，若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前平均預測誤差平方根過大，代表模擬效果差，應將該國家之檢測結果刪除不予納入。故本研究參考 Abadie et al. (2010)以實驗組平均預測誤差平方根 2 倍或 5 倍做為判斷標準，若超過此標準，則予以剔除。圖 7 與圖 8 分別為剔除 RMSPE 大於 5 倍及大於 2 倍的國家[3]。

[3] 由於義大利之平均預測誤差平方根值過小，導致無平均預測誤差平方根小於 2 倍之國家，因此僅於圖 7 中呈現刪除平均預測誤差平方根大於 5 倍之國家作為安慰劑測試。

臺灣期刊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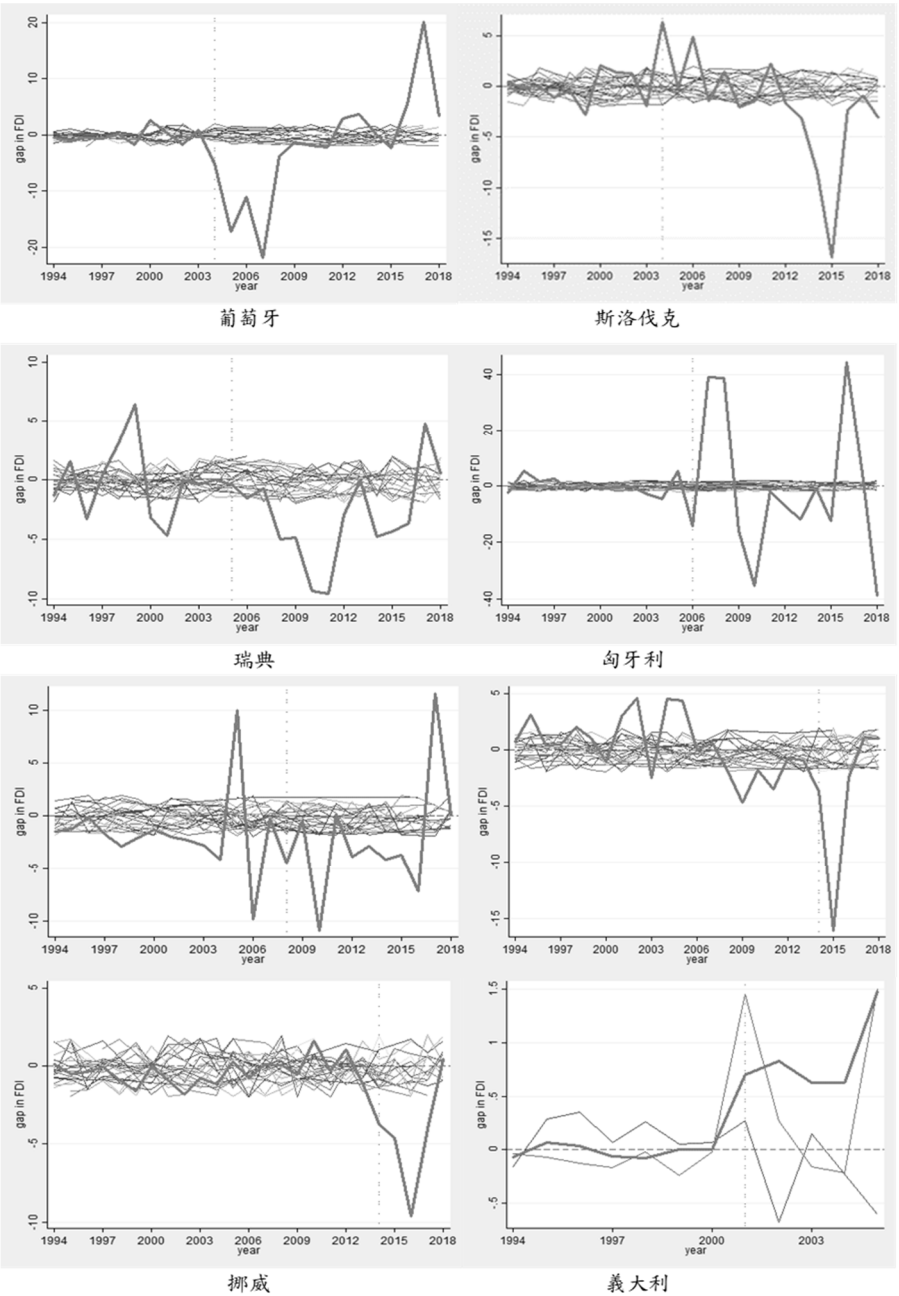


圖 7 安慰劑測試-刪除 RMSPE 大於 5 倍的國家

臺灣大學財稅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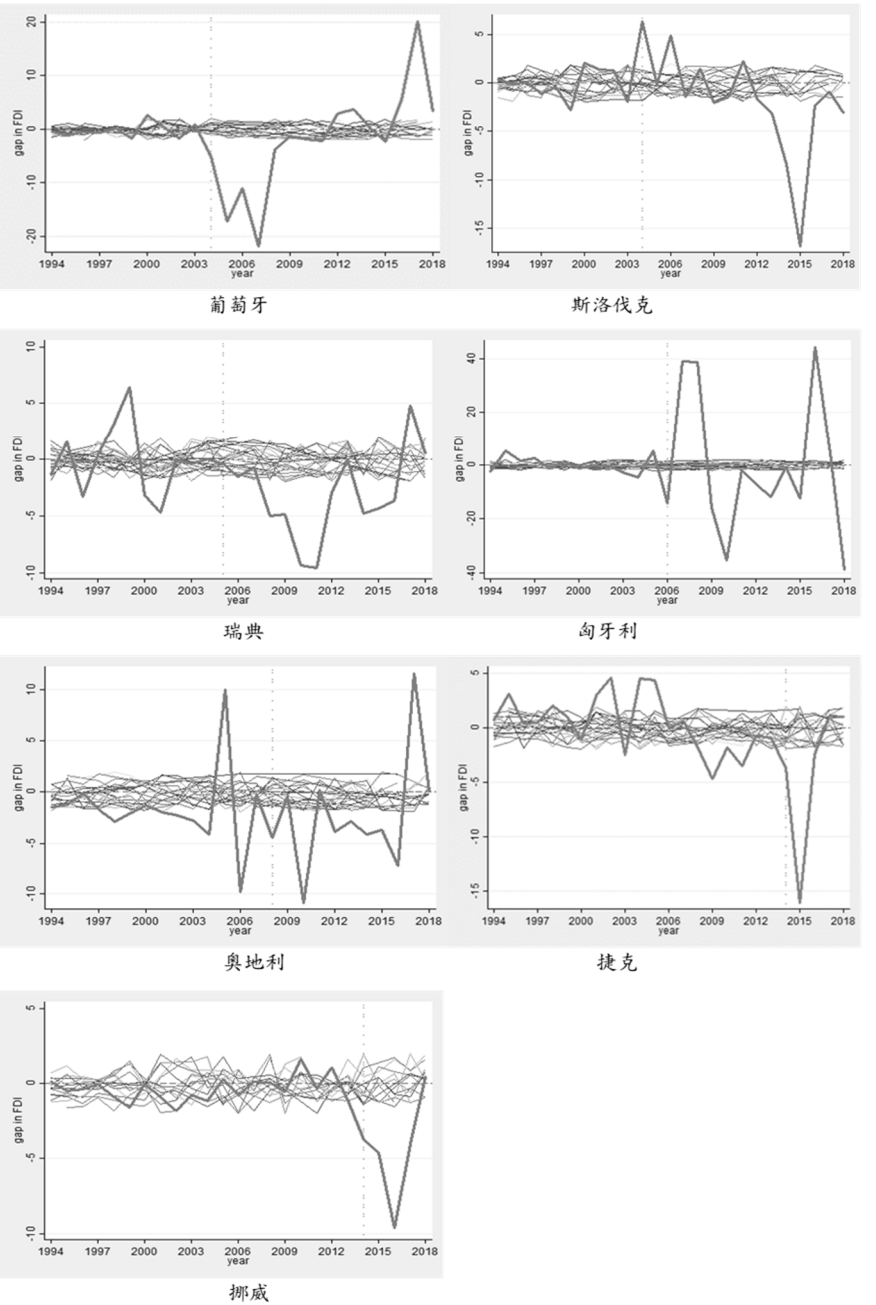


圖 8 安慰劑測試-刪除 RMSPE 大於 2 倍的國家

臺灣人

由圖可知，葡萄牙之線圖自 2004 年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紅色粗線與其餘細線明顯在方向以及幅度上皆有顯著不同，代表政策效果是顯著的。短期葡萄牙 FDI 與模擬之差異數為負，呈現下滑趨勢，而其他國家則呈現隨機離散狀況，代表經安慰劑測試後廢除遺贈稅對 FDI 流入之短期政策效果顯著不佳；而長期葡萄牙 FDI 與模擬之差異數為正，其他國家則呈現隨機離散狀況，代表經安慰劑測試後廢除遺贈稅對 FDI 流入之長期政策效果顯著為正。斯洛伐克之線圖自 2004 年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紅色粗線與其餘細線明顯在方向以及幅度上皆有顯著不同，代表政策效果是顯著的。短期斯洛伐克 FDI 與模擬之差異數為正，而其他國家則呈現隨機離散狀況，代表經安慰劑測試後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 FDI 流入仍具有實質上的正向顯著，長期而言斯洛伐克 FDI 與模擬之差異數為負，其他國家則呈現隨機離散狀況，代表經安慰劑測試後長期廢除遺贈稅對 FDI 流入之影響顯著為負。瑞典之線圖自 2005 年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紅色粗線與其餘細線明顯在方向以及幅度上皆有顯著不同，代表政策效果是顯著的。而且 FDI 與模擬之差異數亦多為負數，而其它則呈現隨機離散狀況，代表經安慰劑測試後廢除遺贈稅對 FDI 流入之影響顯著為負。

其次，匈牙利之線圖則是自 2006 年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紅色粗線與其餘細線明顯在方向以及幅度上皆有顯著不同，代表政策效果是顯著的。匈牙利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短期 FDI 與模擬之差異數多為正數，而其他國家則呈現隨機離散狀況，代表經安慰劑測試後短期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 FDI 流入仍具有實質上的正向顯著，但長期匈牙利 FDI 與模擬之差異數為負，其他國家則呈現隨機離散狀況，代表經安慰劑測試後長期廢除遺贈稅對 FDI 流入之影響顯著為負。奧地利之線圖自 2008 年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紅色粗線與其餘細線明顯在方向以及幅度上皆有顯著不同，代表政策效果是顯著的。此外，奧地利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實際 FDI 與合成數據之差異數大多為負，而其他國家則呈現隨機離散狀況，代表經安慰劑測試後廢除遺贈稅對 FDI 流入之影響顯著為負。

捷克之線圖自 2014 年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首年實際 FDI 與合成組數據之差異數大幅為負，而其他國家則呈現隨機離散狀況，但後續年度 FDI 與合成組數據之差異數為正，故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 FDI 流入之政策效果有待後續觀察。挪威之線圖自 2014 年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實際 FDI 與合成組數據之差異數大多為負，而其他國家則呈現隨機離散狀況，代表經安慰劑測試後廢除遺贈稅對 FDI 流入之影響顯著為負。義大利之線圖則是自 2001 年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紅色粗線穩健向上，其餘細線呈現隨機而非上升趨勢，代表政策效果是顯著的。同時義大利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實際 FDI 與合成組數據之差異數皆為正數，而其他國家則呈現隨機離散狀況，代表經安慰劑測試後廢除遺贈稅對 FDI 流入之影響仍顯著為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穩健性分析

由於本文研究期間除了面臨 2000 年的金融海嘯衝擊外，歐洲亦另外發生歐債危機，因此歐洲的總體經濟環境可能與美洲或亞洲國家不同。因此，在實驗組國家皆為歐洲的情況下，本文將控制組國家亦限縮為以歐洲國家為主[4]。由表 5 可知，除了實驗組國家外，歐洲地區國家共有 19 國。實證結果可由附錄一中之圖 S1 至圖 S6 得知，當控制組國家由 28 個 OECD 國家限縮為只有 19 個歐洲地區的國家時，整體的實證分析及相關的檢測結果均獲得一致結論。

此外，為了增加解釋力，本文亦參考羅時萬等(2024)以及連昱羽等(2024)之作法，加入人均 GDP、金融發展、年均工資、總固定資本、工作年齡人口、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總儲蓄、人口成長率以及專利成長率，納入作為控制變數，重新執行測試。新增變數之定義與資料來源如表 7，敘述性統計則如表 8。再者，為了消除非定態趨勢因素，進而解決合成控制估計量漸近偏誤的問題，在參考了 Ferman and Pinto (2021)、Huang and Huang (2022)、羅時萬等(2024)以及連昱羽等(2024)的作法後，將研究中的被解釋變數減去實驗組國家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政策前的平均值，使得數據去平均化(de-mean)。同時亦另外將每個國家的外人直接投資每年皆減去控制組國家於樣本期間中各年的平均值，使得數據去趨勢化(de-trend)[5]。透過去平均化(de-mean)與去趨勢化(de-trend)的調整後數值，可參見表 3.1，而實證的結果則可參考附錄二。綜合上述的作法，不論是將樣本限縮於只有歐洲地區國家，或者新增加控制變數於模型中，仍能發現所得結論趨於一致。

[4] 作者感謝匿名委員提出此項建議。
[5] 作者感謝匿名審查人針對數值應進行去平均化與去趨勢化之建議。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7　新增控制變數之定義與資料來源

新增控制變數	變數定義	資料來源
人均 GDP	某一國在一年內生產之所有最終財貨和勞務的價值除以年中人口數。	世界銀行國民帳資料，以及 OECD 國民帳資料檔。
金融發展	銀行存款占 GDP 的比例及股票市值占 GDP 的比例總和。	整理自國際金融統計(IFS)，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交易所聯合會、《全球股票市場概況》及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補充資料。
年均工時	受僱人員平均每年工作時數。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8.1)
總固定資本	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原稱為國內固定投資)包括土地改良(如圍欄、溝渠、排水設施等)、廠房、機器與設備的購置，以及道路、鐵路等基礎建設的建造，其中也包括學校、辦公室、醫院、私人住宅，以及商業與工業建築物等的建設。	世界銀行國民帳戶資料，以及 OECD 國民帳戶資料檔。
工作年齡人口	15 至 64 歲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	聯合國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24 年修訂版》。
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	個人所得稅之最高邊際稅率。	OECD 統計資料庫
總儲蓄	以國民總所得減去總消費，再加上淨移轉所計算得出。	世界銀行國民帳資料，以及 OECD 國民帳資料檔。
人口成長率	年度人口成長率。	根據總人口推算。人口資料來源包括：(1) 聯合國人口司、(2) 各國統計機構的統計資料庫與出版品、(3) 歐洲統計局(Eurostat)以及(4) 聯合國統計司。
專利成長率	各國專利存量的年成長率。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WIPO 專利報告：全球專利活動統計》。

註：所有新增之變數均是參考連昱羽等(2024)、羅時萬等(2024)以及連昱羽(2022)文中所使用之定義，再由本文整理。

表 8　新增控制變數之敘述性統計

變數名稱	樣本數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標準差
人均 GDP	900	33104.11	112417.90	4639.51	21023.51
金融發展	886	122.43	776.27	1.19	91.44
年均工時	895	1776.54	2645.17	1380.78	218.79
總固定資本	897	22.98	38.11	11.16	4.01
工作年齡人口	900	66.66	73.28	58.74	2.35
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	798	0.61	30.89	0.00	2.40
總儲蓄	853	23.33	42.23	4.80	5.82
人口成長率	900	0.54	2.89	-2.26	0.78
專利成長率	900	1.97	182.81	-100.00	25.11

註：本研究自行計算與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伍、結論

FDI 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故各國政府乃透過各種租稅競爭策略希望能吸引 FDI 流入，本文採用合成控制法，對 2000 年後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 OECD 國家的 FDI 表現進行反事實分析，進而研究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有可能做為租稅競爭的策略，而對 FDI 流入產生正向影響效果嗎？研究發現僅義大利廢除後吸引 FDI 流入顯著為正，其他採用與遺產及贈與稅性質相同的財產稅作為配套措施之國家(瑞典、匈牙利、奧地利、捷克、挪威)，除匈牙利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初期受惠於加入歐盟等因素影響，使得初期 FDI 明顯成長外，其餘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對 FDI 流入均顯著為負，顯示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改採用其他財產稅性質之租稅取代，會大幅抵銷其效果，故未能夠帶入更多 FDI 流入；而未實施配套措施之葡萄牙與配套措施採用印花稅之斯洛伐克，研究結果則顯示要持續吸引外資投入需使用更多政策相互配合，若僅採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作為租稅競爭策略，則恐怕需要更多時間才能反映成效或無法長期持續帶動 FDI 流入。

透過 OECD 國家之實證結果，我們發現各國若是以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作為租稅競爭策略，則其對 FDI 流入之影響效果將不一致，除了因各國財政體質與財政體制不同外，也可能因為採用之配套措施有異而有不同的結果，因此若欲採用廢除遺贈稅作為租稅競爭策略來吸引 FDI 流入時，政府須審慎思考並評估使用之配套措施，例如減少採用同為財產稅性質之租稅，因其容易形成變相課稅而大幅抵銷其廢除遺贈稅之效果。此外，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亦需有其他政策配合才能帶動 FDI 持續的流入，否則若廢除遺產及贈與稅未能達到吸引 FDI 流入之目標，反而造成政府稅收減少，將影響國家財政支出，實屬得不償失，因此本文之研究結果可提供各國政府若希望透過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吸引 FDI 流入做為參考，並提供一項證據來說明廢除遺產與贈與稅可能並非是吸引外資的萬靈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一

根據圖 S1 並與圖 3 進行對照，可發現實驗組與歐洲控制組國家之 FDI 趨勢圖並無明顯差異，換言之，實驗組國家雖然實行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但在實行後，仍無法對 FDI 有顯著的提升效果。此外，為了再次檢視模擬效果是否良好，再改以僅用歐洲地區國家做為控制組進行模擬，如圖 S2 所示。圖 S2 中的實線代表實驗組國家，而虛線則為以歐洲國家做為控制組之模擬合成組數據，若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前之實線與虛線貼近，代表模擬效果佳，極具參考價值。根據圖 S2 可知，8 個實驗組國家在其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前之實線與虛線均極為貼近，然而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挪威與義大利之實際 FDI 先低於模擬合成之數據而後又貼合，表示倘若未實施遺產及贈與稅的廢除反而可能不會影響外資流入，而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對 FDI 的確造成短期限衝擊。

此外，為了能更清楚呈現實驗組國家與歐洲地區控制組國家所模擬合成之數據兩者間的差距，可以透過圖 S3 觀之。將圖 S3 與圖 5 比較，可發現除了瑞典有較明顯的不同外，其餘 7 個實驗組國家的模擬數據並無太大差別。

根據羅時萬等(2024)文中所言，關於政策效果的顯著性可以透過多種方式來檢驗，因此，為了檢驗實驗組與歐洲地區控制組國家之間的效果是否具有顯著差異性，乃針對歐洲地區控制組國家進行安慰劑測試。如原先做法，我們將沒有實施廢除遺產及贈與稅之歐洲地區控制組國家進行合成控制法之模擬，再與實驗組國家進行比較，此方法稱之為空間內的安慰劑檢驗，新的比較結果如圖 S4。圖 S4 中的紅色粗線即為實驗組國家之 FDI 實際值與模擬值之差異數，而其餘各條細線則為歐洲地區控制組國家 FDI 實際值與模擬值之差異數。比較圖 S4 與圖 6 仍可發現有微小不同，但整體而言之結果與原先採用所有 OECD 國家作為控制組並無太大差異，其實際值與合成控制組模擬值間的差異在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前大部分都接近 0，表示合成控制組與實驗組國家的 FDI 趨勢相匹配，而廢除遺產及贈與稅後實驗組國家的 FDI 趨勢則明顯有較大的波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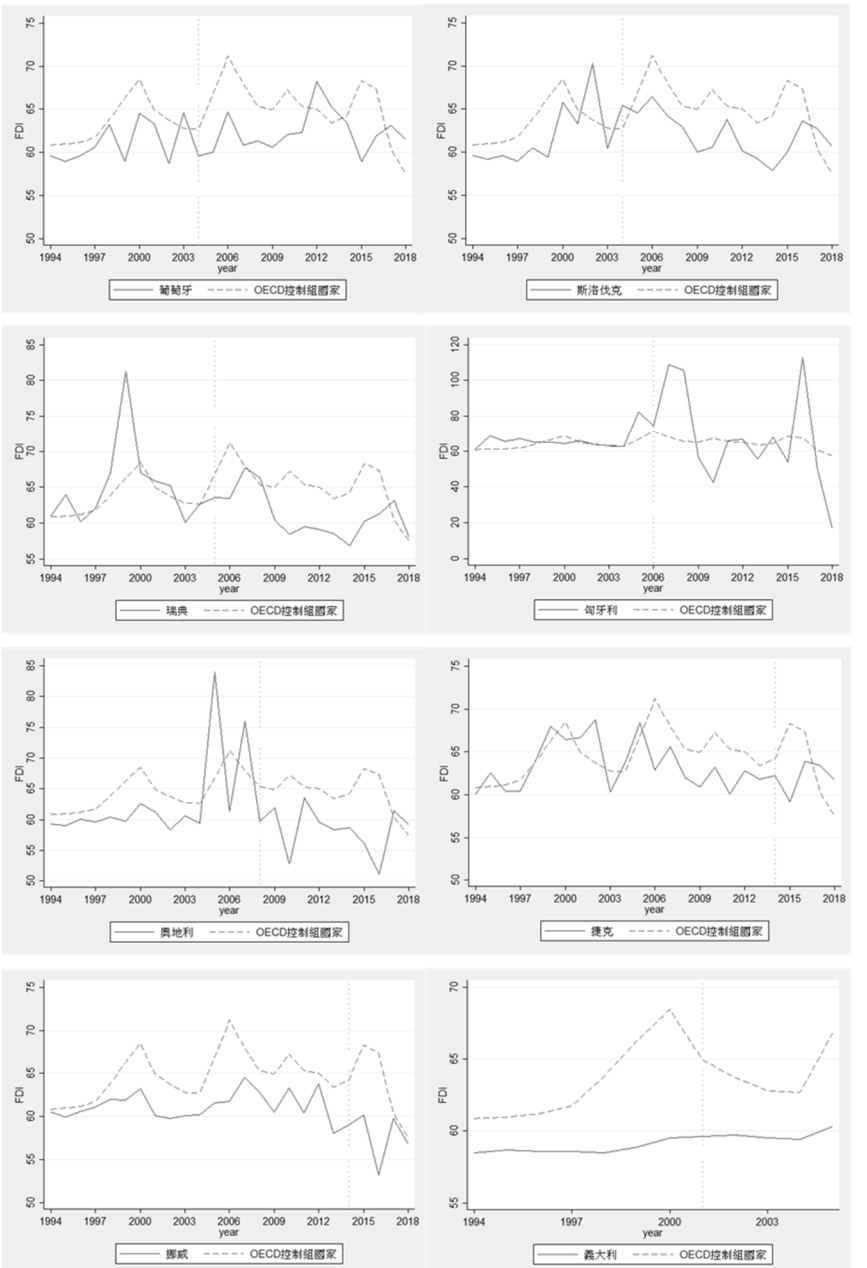


圖 S1 實驗組國家與歐洲控制組國家 FDI 趨勢圖

臺灣大學學術倫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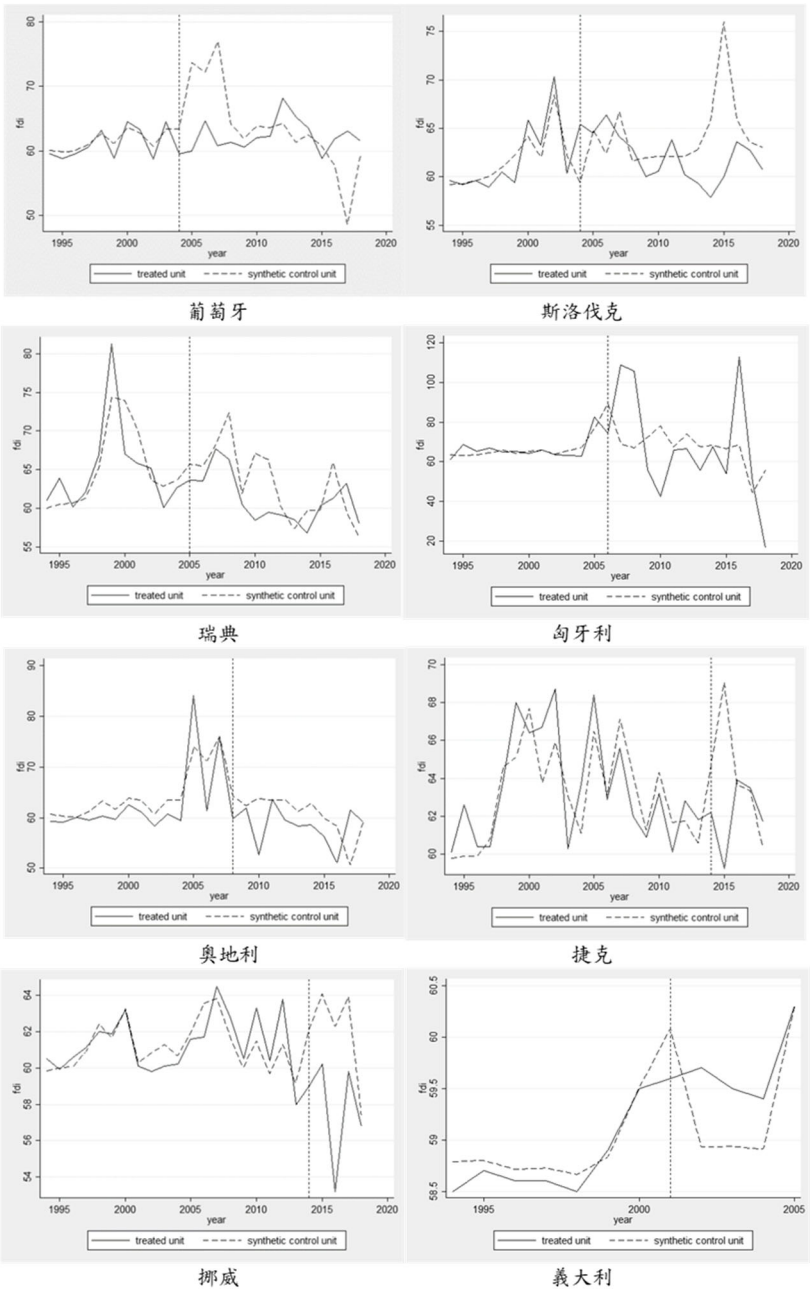


圖 S2 實驗組國家與模擬實驗組國家之 FDI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由於進行安慰劑效果檢測時，仍需考慮被檢測國家之平均預測誤差平方根(Root Mean Square Prediction Error, RMSPE)在廢除遺產與贈與稅前之大小，若平均預測誤差平方根過大，則代表模擬效果較差應予以刪除。在參考 Abadie et al. (2010)之作法後，本文將以實驗組平均預測誤差平方根 2 倍及 5 倍做為判斷標準，超過此標準者便予以剔除。圖 S5 與圖 S6 即為分別剔除 RMSPE 大於 5 倍及 2 倍的國家。

綜上所述，當我們把控制組國家由 28 個 OECD 國家限縮為只有 19 個歐洲地區的國家時，整體的實證分析及相關的檢測結果均獲得一致結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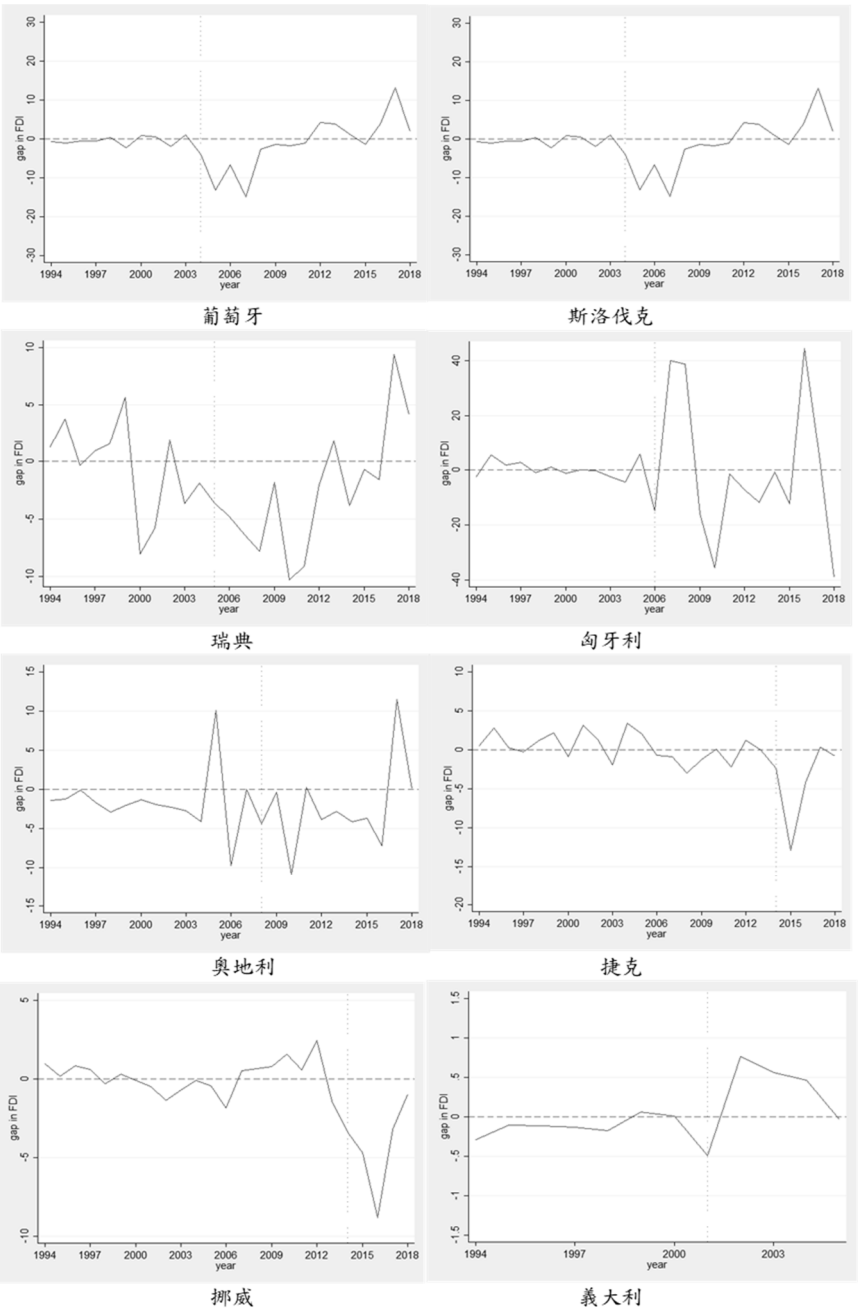


圖 S3 模擬實驗組國家之 FDI 差異圖

臺灣大學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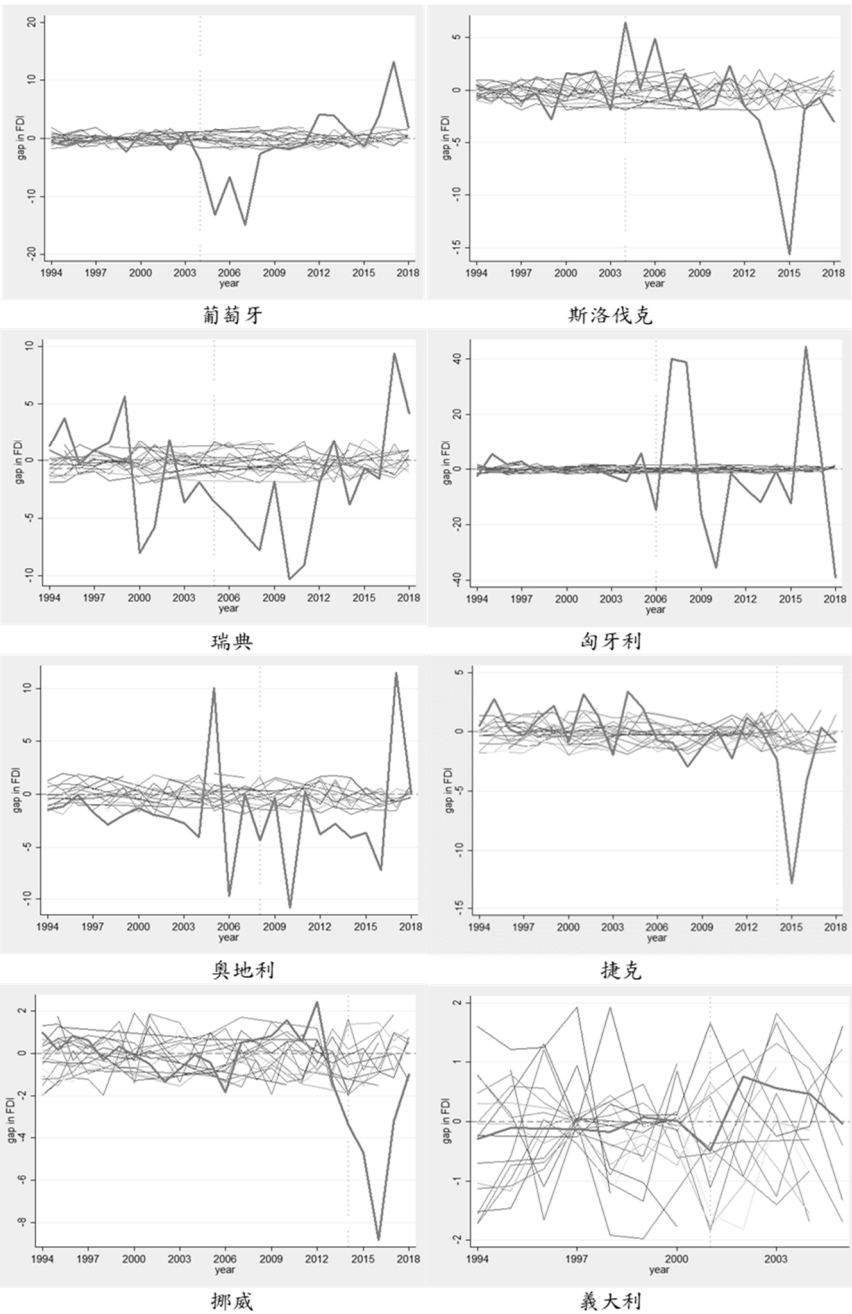


圖 S4 安慰劑測試—歐洲地區控制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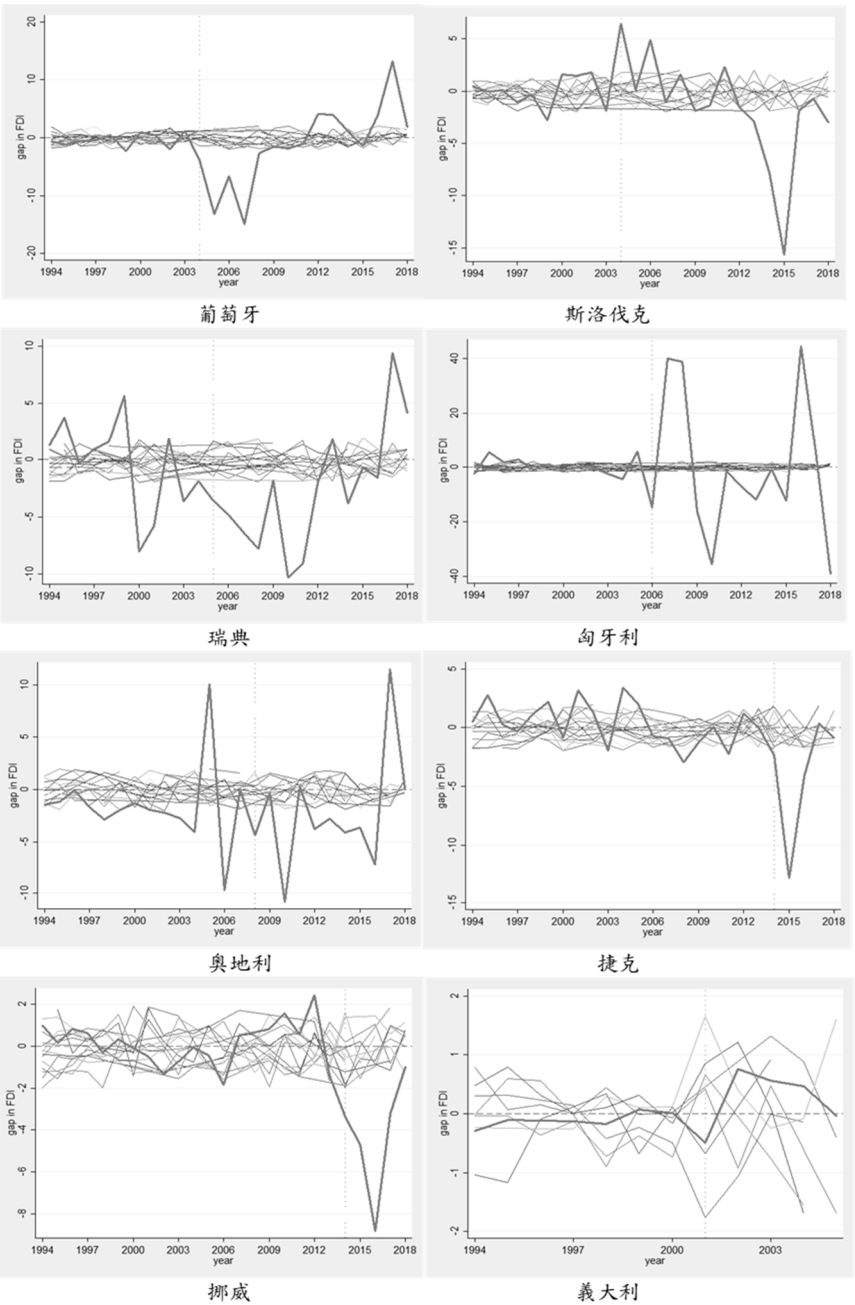


圖 S5 安慰劑測試—刪除 RMSPE 大於 5 倍的國家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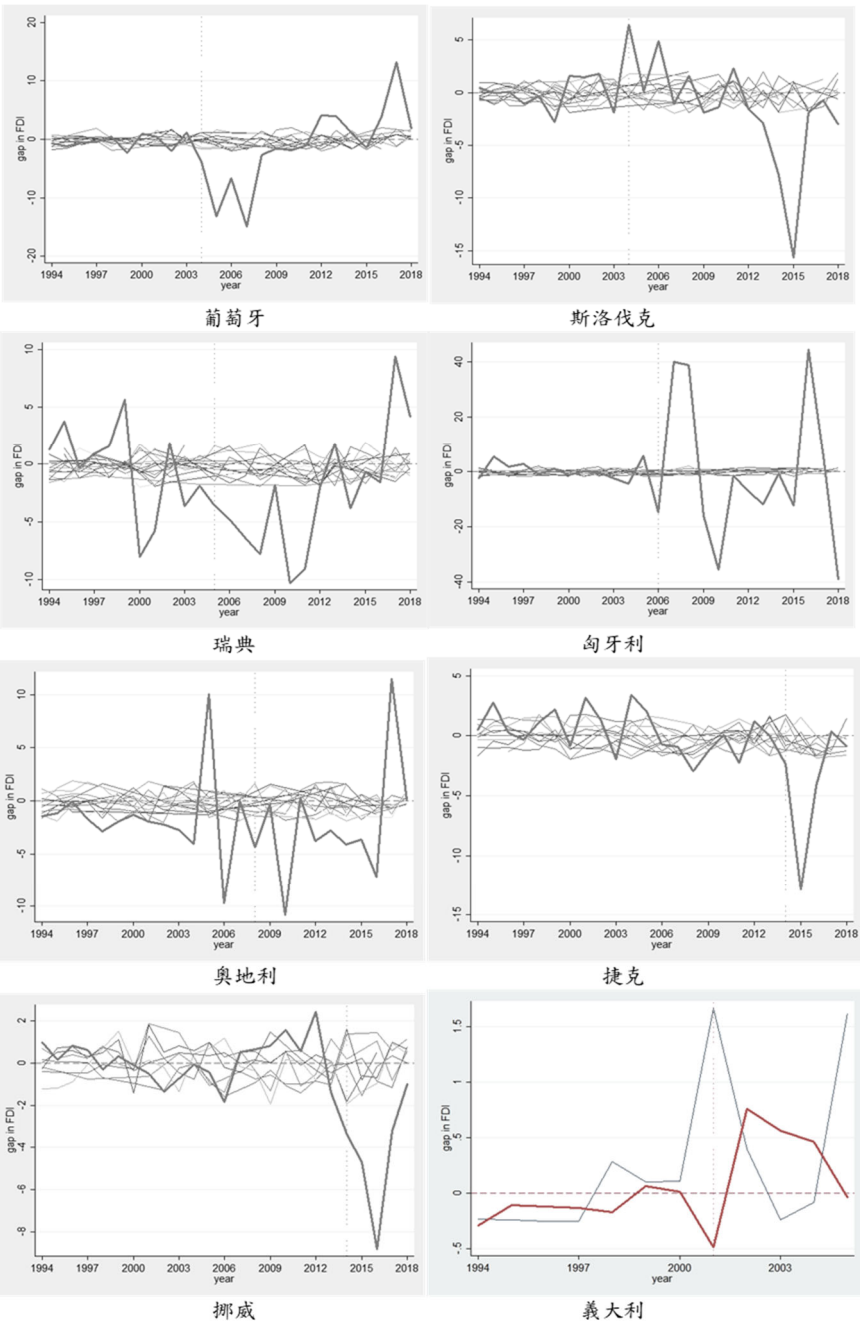


圖 S6 安慰劑測試—刪除 RMSPE 大於 2 倍的國家

附錄二

透過去平均化(de-mean)與去趨勢化(de-trend)調整後之數據重新測試後，可整理出實驗組國家與控制組國家的 FDI 趨勢圖，如圖 S7、實驗組國家與模擬實驗組國家之 FDI，如圖 S8、模擬實驗組國家之 FDI 差異圖，如圖 S9、安慰劑測試—新增樣本之控制組國家，如圖 S10、安慰劑測試—刪除 RMSPE 大於 5 倍的國家(新增樣本)，如圖 S11，以及安慰劑測試—刪除 RMSPE 大於 2 倍的國家(新增樣本)，如圖 S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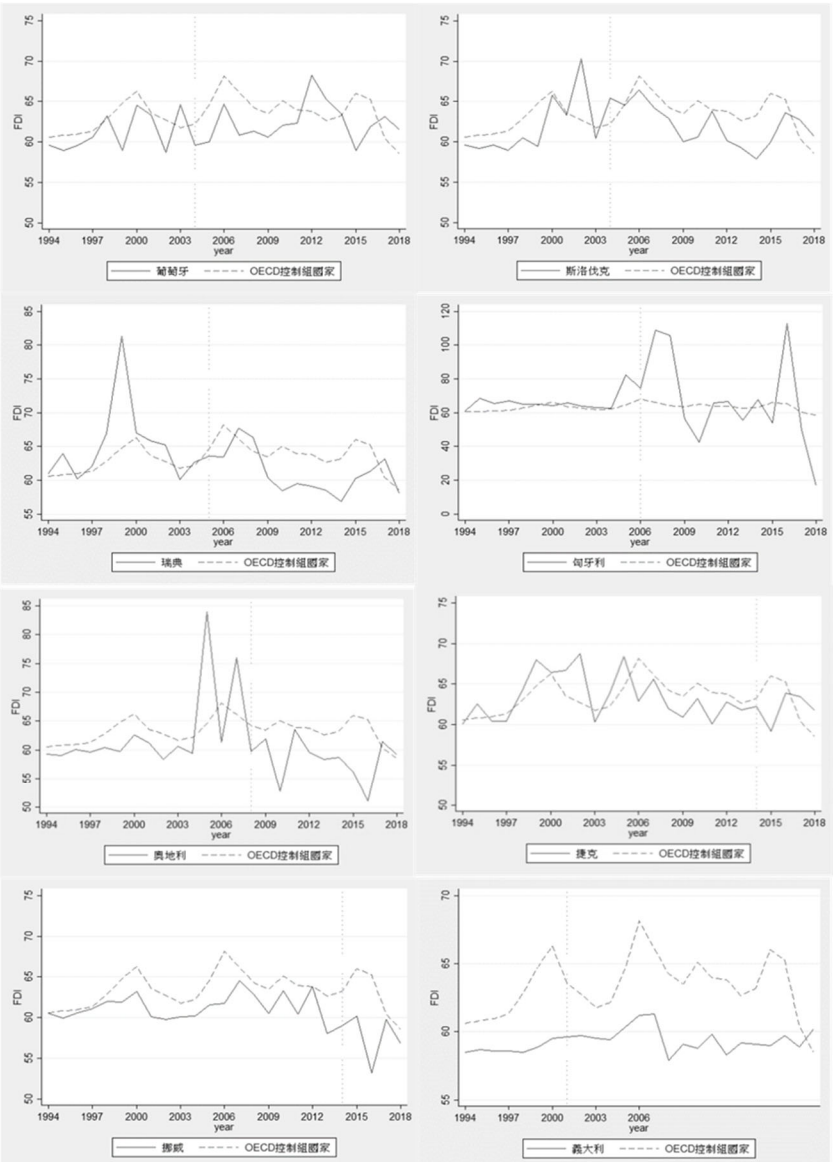


圖 S7 實驗組國家與歐洲控制組國家 FDI 趨勢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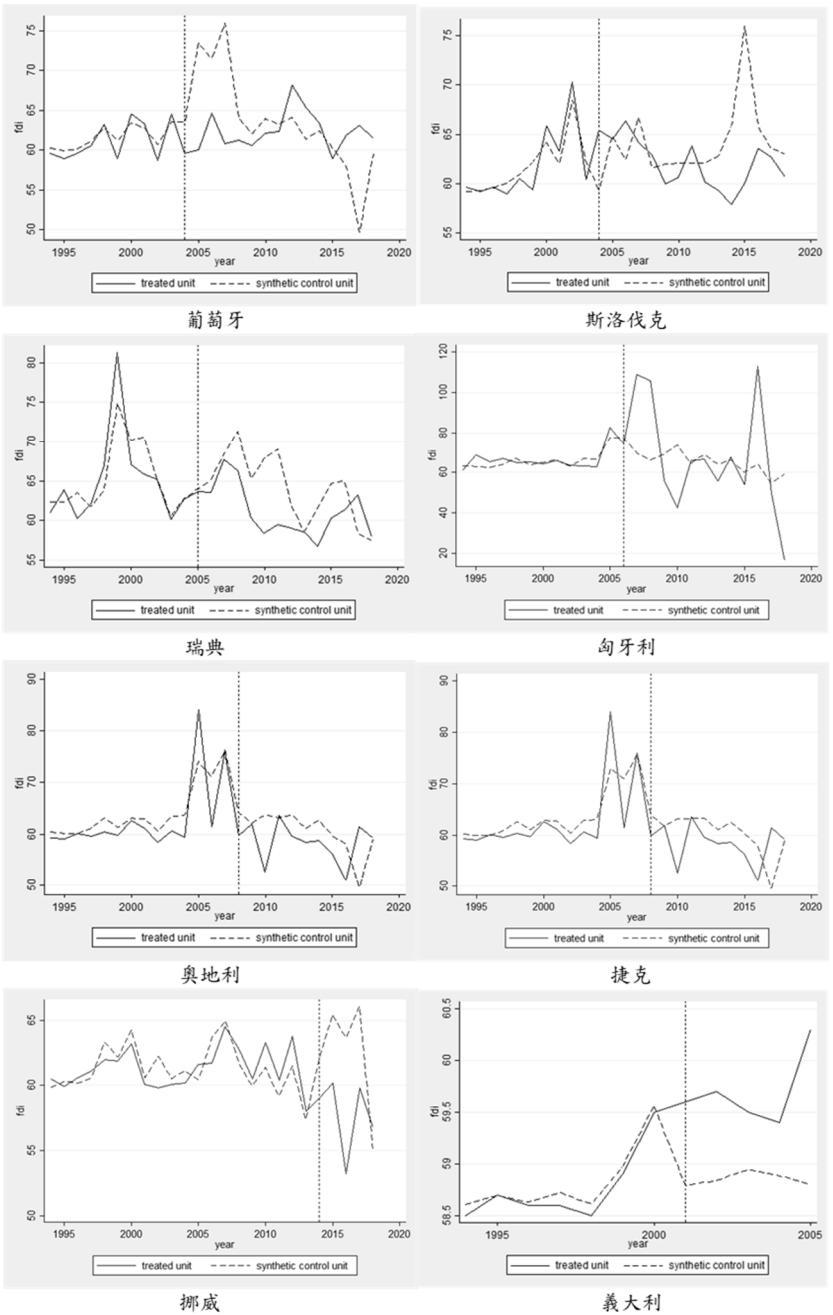


圖 S8 實驗組國家與模擬實驗組國家之 FDI

臺灣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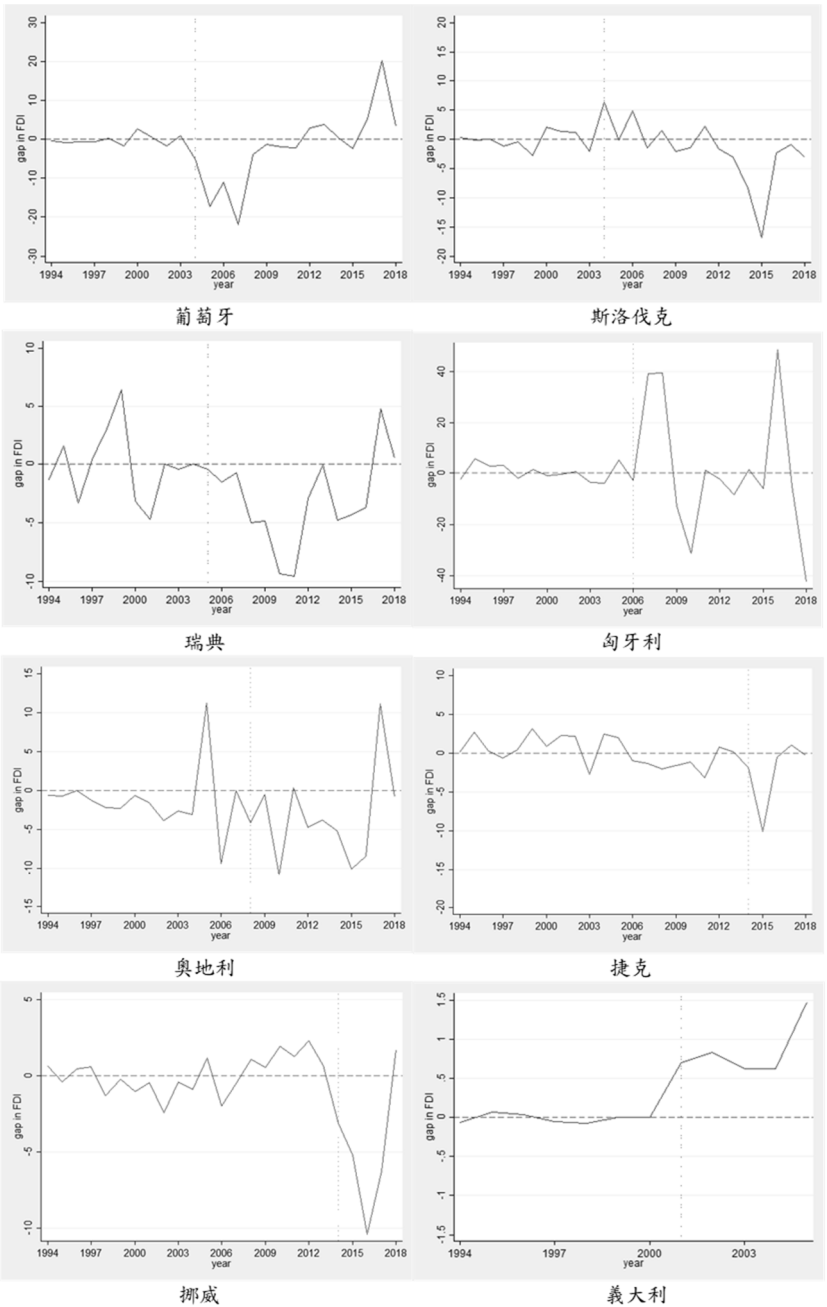


圖 S9 模擬實驗組國家之 FDI 差異圖

臺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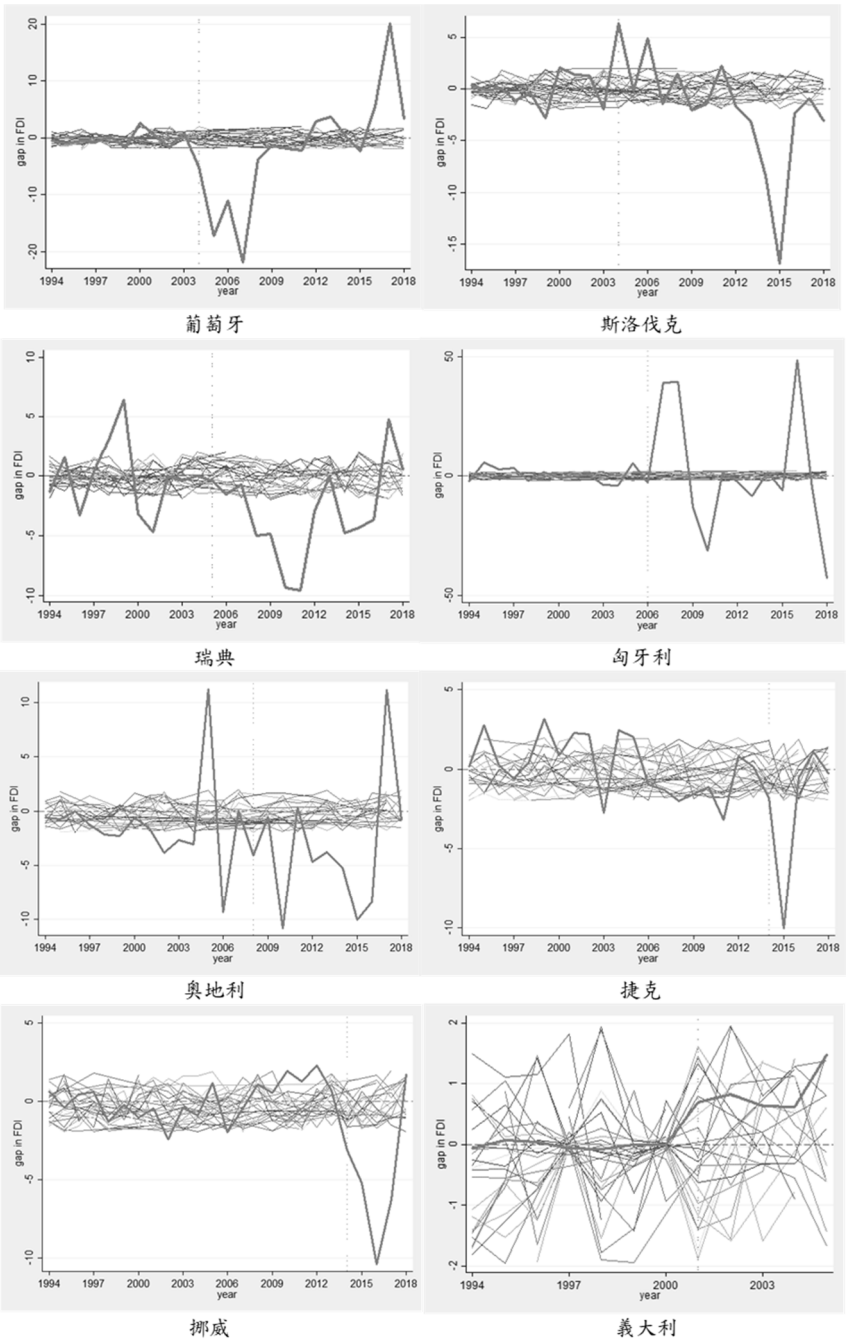


圖 S10 安慰劑測試—新增樣本之控制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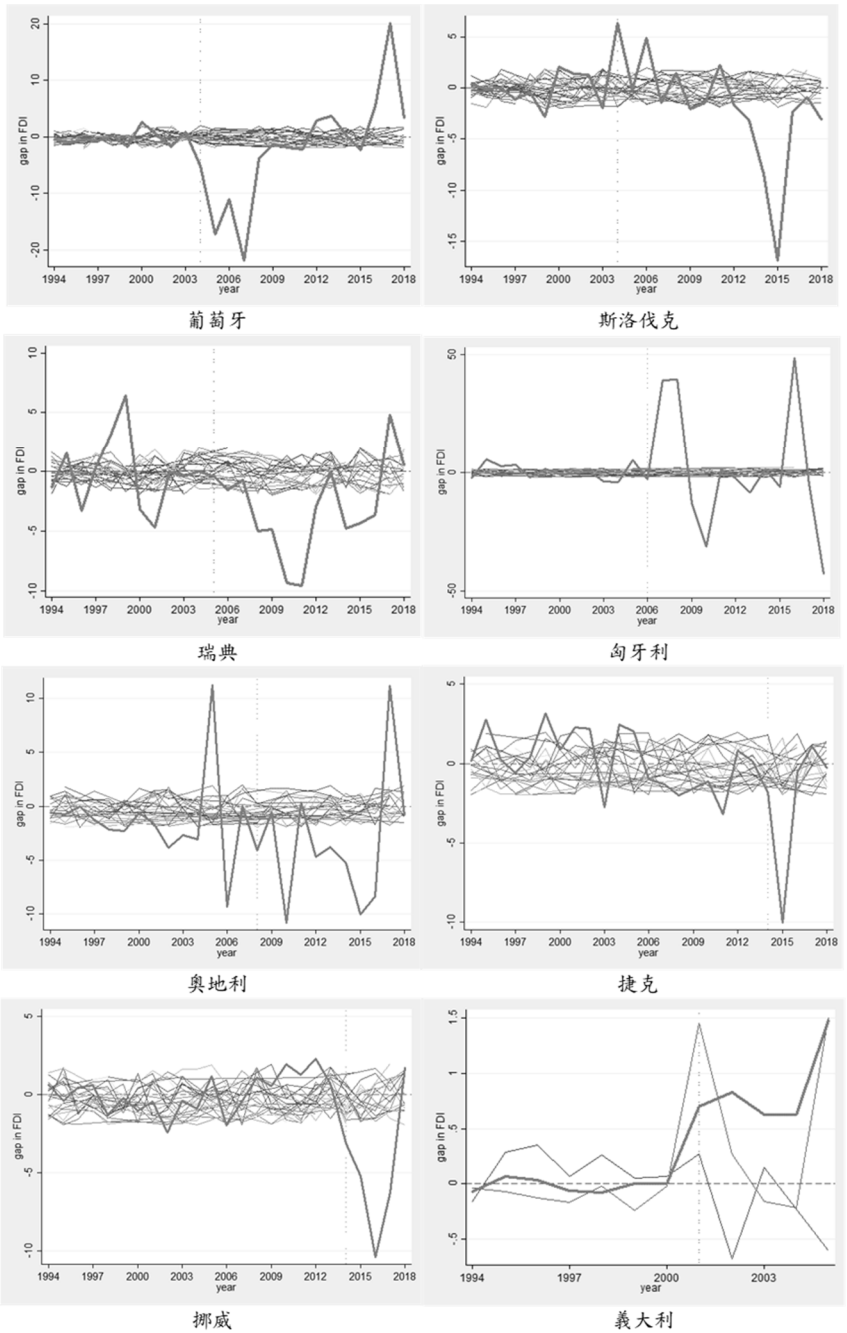


圖 S11 安慰劑測試—刪除 RMSPE 大於 5 倍的國家(新增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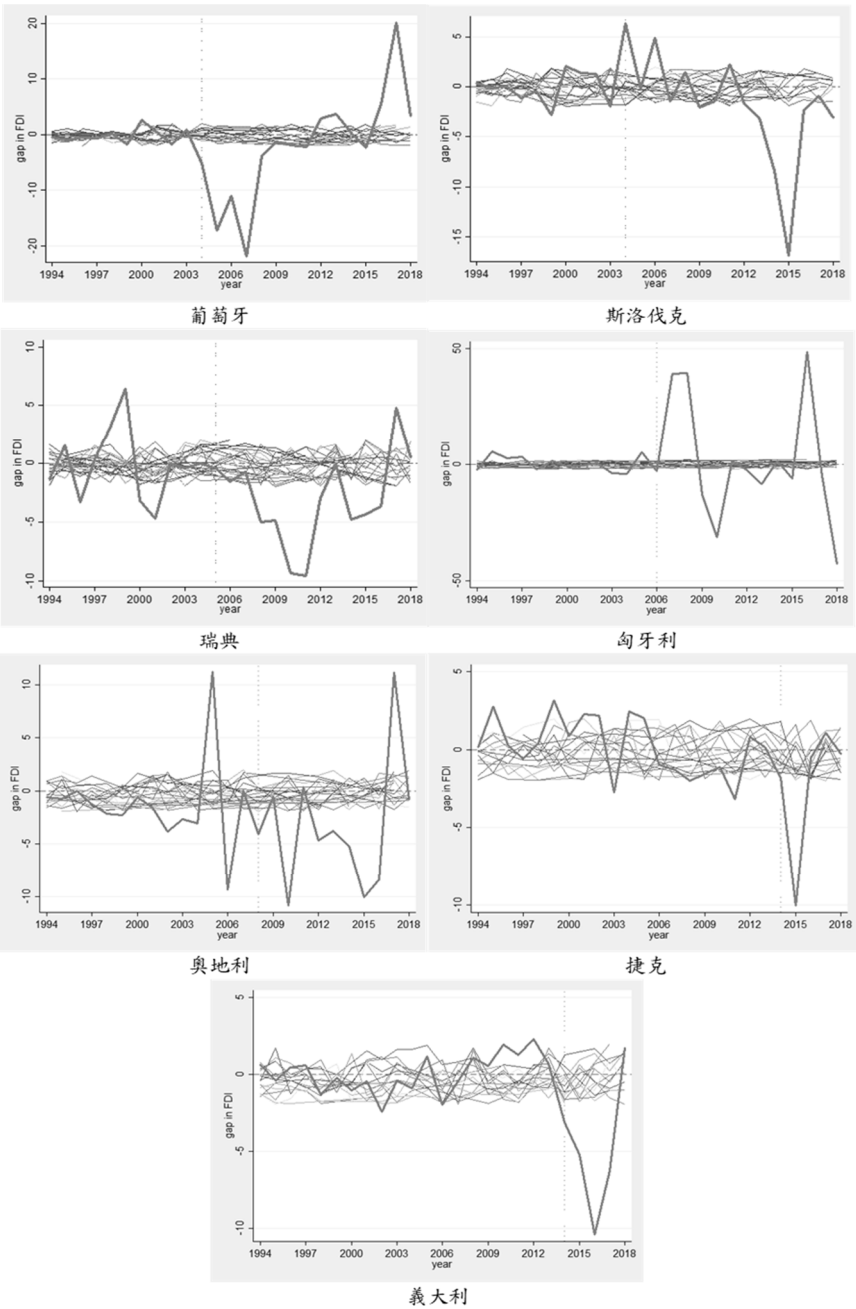


圖 S12 安慰劑測試—刪除 RMSPE 大於 2 倍的國家(新增樣本)

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參考文獻

朱澤民、陳國樑、王肇蘭、黃勢璋，2016，我國「遺產及贈與稅稅制檢討」，財政部 104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編號：104mof007)，臺北：財政部。(Chu, Tse-Min., Kuo-Liang Chen,Wang-Chao Lan, and Shih-Chang Huang. 2016. “A Study on the Review of Taiwan’s Inheritance and Gift Tax System.” Research Project Commission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Project No. 104mof007.)

李彥幸，2011，遺贈稅調降效果之研究，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Lee, Yen-Hsing. 2011. *A Study on Reduction Effects of Estate & Gift Tax.* Master thesis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Tamkang University.)

李禮仲與周信佑，2008，調降遺贈稅的另一種思維，國政評論。(Li, Li-Chung, and Hsin-Yu Chou. 2008.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lowering the estate and gift tax. *NPF Commentary*.)

沈晉瑋，2019，關稅與稅賦政策對我國外人直接投資的實證分析，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學位論文。(Shen, Chin-Wei. 2019. *Tariff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 Empirical Study for Taiwan*. Master thesis of Economics progra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林智聖，2013，臺灣調降營所稅對資金回流影響之實證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班學位論文。(Lin, Chih-Sheng. 2013. *The Influence of the Reduction of Corporate Tax Rate on the Repatriation of Overseas Funds in Taiwan*. Master thesis of Accountancy progra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侯旭娟，2013，遺產及贈與稅調降後之政策效果探討，國立成功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學位論文。(Hou, Hsu-Juan. 2013.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olicy Outcomes after the Estate and Gift Tax Reduction in Taiwan*. Master thesis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施若盈，2013，台灣調降營利事業所得稅對外人直接投資 (FDI) 影響，國立成功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Shi, Rio-Ying. 2013. *The Influence of the Reduction of Corporate Tax Rate on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aiwan*. Master thesis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Finance progra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徐耀浤，2010，以政策競爭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之研究，經濟研究年刊，10，399-422。(Hsu, Yao-Hung. 2010. A Study on Policy as a Means of Competing to At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conomic Research* 10 : 399-422.)

許義忠、陳建新與何姍嬬，2022，囤房稅能降低房價所得比嗎？合成控制法的應用，台灣土地研究，第 25 卷，第 2 期：121-155。(Hsu,Yi-Chung ., Jian-Hsin Chen, and Shan-Ju Ho. 2022. Can vacant house tax policy affect housing price-income ratio? A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approach. *Journal of Taiwan Land Research* 25 (2): 121-155.)

連昱羽 ，2022，稅制與所得分配不均—兩稅合一的實驗，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碩士論文。(Lien, Yu- Yu. 2002. *Tax System and Income Inequality—An Experiment from Income Tax Integration*. Master thesis of Public Finance progra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連昱羽、伍大開、石恩銘、陳國樑，2024，兩稅合一制度對所得分配不均之影響—以合成控制法分析，財稅研究，第 53 卷，第 1 期：1-30。(Lien, Yu- Yu, Da-Kai Wu, En-Ming Shih, and Kuo-Liang Chen. 2024. The impact of the income tax integration system on income inequality: An analysis using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Public Finance Review* 53 (1): 1-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一姍與賴建宇，2011，遺產及增與稅一定要降，天下雜誌：406。(Chen, I-Shan, and Chien-Yu Lai. 2011. The estate and gift tax must be cut. *Commonwealth Magazine* 406.)

陳宜廷，2019，臺灣與南韓之經濟成長比較－合成控制法下的反事實分析，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第 50 卷，第 1 期： 1-41。(Chen, Yi-Ting. 2019. A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s and South Korea's economic growth: Synthetic controls for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Taiwan Economic Forecast and Policy* 50 (1): 1-41.)

陳穎勳，2012，全民拼理財>遺產稅逼走的資金 比拿到的多，理財周刊：278。(Chen, Ying-Hsun. 2012. Everyone strives for wealth management > The capital driven away by the estate tax is more than the amount received. *Money Weekly*: 278.)

陳麗如，2016，租稅負擔對外人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跨國實證分析，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租稅管理與理財規劃碩士班學位論文。(Chen, Li-Ju. 2016. *The Effects of Tax Burden on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Evidence from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Master thesis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program,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黃登興，2012，東南亞的外人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臺灣東南亞學刊，第 9 卷，第 1 期：25-53。(Huang, Deng-Shing. 2012. Inward FDI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9 (1): 25-53.)

楊陳旺，2009，遺產稅廢除與調降對於海外資金回流之探討，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論文。(Yang, Cheng-Wang. 2009.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olition / reduction of estate tax and the repatriation of overseas funds. Master thesis of Accountancy progra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薛凌，2008，廢除遺贈稅 吸引資金回流 建設台灣，立法院。(Hsueh, Ling. 2008. Abolish the estate and gift tax, attract capital repatriation, and build Taiwan. *Legislative Yua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羅時萬、伍大開、連昱羽、陳國樑與黃勢璋，2024，稅制與所得分配不均—兩稅合一的準實驗，經濟論文叢刊，第 52 頁，第 2 期：155-195。(Lou, Shi-Wan., Da-Kai Wu, Yu-Yu Lien, Kuo-Liang Chen, and Shih-Chang Huang). 2024. Tax policy and income inequality - A quasi-experiment from income tax integration. *Taiwan Economic Review* 52 (2): 155-195.)

Abadie, A. 2021. Using synthetic controls: Feasibility, data requirements, and methodological aspec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9 (2): 391-425.

Abadie, A., A. Diamond, and J. Hainmueller. 2010.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for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California's tobacco control progra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05: 493-505.

Abadie, A., and J. Gardeazabal. 2003. The economic costs of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the basque count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 (1): 113-132.

Alfaro, L., A. Chanda, S. Kalemli-Ozcan, and S. Sayek. 2004. FDI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local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4 (1): 89-112.

Anderwald, A. M., and R. Niemann. 2023. Is the inheritance and gift tax a reasonable alternative for the net wealth tax?: 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across OECD countries. *Intertax* 50 (6/7): 512-520.

Azémar, C., and A. Delios. 2008. Tax competition and FDI: The special cas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2 (1): 85-108.

Becker, M., G. Pfeifer, and K. Schweikert. 2021. Price effects of the Austrian fuel price fixing act: A synthetic control study. *Energy Economics* 97: 1-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Beebeejaun, A. 2023. An analysis of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CFC) rules of Mauritius;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he UK and 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Management* 65 (6): 586-599.

Burman, L. E., R. McClelland, and C. Lu. 2018. Do Estate and Inheritance Taxes Affect Entrepreneurship?. Tax Policy Center.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www.taxpolicycenter.org/publications/do-estate-and-inheritance-taxes-affect-entrepreneurship.

Cass, D. 1965. Optimum growth in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2 (3): 233–240.

Davies, R. B., and H. T. Naughton. 2014. Cooperation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A spati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1 (5): 923-954.

Davies, R. B., H. Egger, and P. Egger. 2010. Profit taxation and the mode of foreign market entr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3 (2): 704-727.

Davies, R. B., P. J. Norbäck, and A. Tekin-Koru. 2010. The effect of tax treaties on multinational firms: New evidence from microdata. *The World Economy* 32 (1): 77–110.

Davies, R. B., Y. Han, K. Hynes, and Y. Wang. 2023. Competition in tax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1 (3): 931-955.

De Nardi, M., and F. Yang. 2016. Wealth inequality, family background, and estate taxat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77: 130-145.

Dewit, G., K. Hynes, and D. Leahy. 2018. Corporate tax games with cross-border externalities from public infrastructure. *Economic Inquiry* 56 (2): 1047-1063.

Ferman, B., and C. Pinto. 2021. Synthetic controls with imperfect pretreatment Fit. *Quantitative Economics* 12 (4): 1197-1221.

Gale, W. G., O. Hall, and J. Sabelhaus. 2025. Follow the Money: Tax Inheritances, Not Estat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follow-the-money-tax-inheritances-not-estates/.

Genschel, P., J. Limberg, and L. Seelkopf. 2024. Revenue, redistribution,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heritance tax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7 (9): 1475-1505.

Giertz, S. H., J. M. Feldman, and J. Saving. 2012. Tax effect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review of empirical evidenc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González-Val, R., and M. Marcén. 2024. Population growth and taxes: The effect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Spanish inheritance tax.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73: 135-163.

Grogger, J. 2017. Soda taxes and the prices of sodas and other drinks: Evidence from Mexico.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9 (2): 481-498.

Hansson, A. M., and K. Olofsdotter. 2013. FDI, taxes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the EU15. *Applied Economics* 45 (18): 2653-2664.

Huang, F. Y., and P. C. Huang. 2022. Effects of a per-bag trash collection fee program: Evidence from a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Academia Economic Papers* 50 (1): 1-39.

Janeba, E. 1995. Corporate income tax competition, double taxation treati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56 (2): 311-325.

Kim, S. K., M. Kim, and Y. H. Kim. 2012. The impacts of PTA formation on small economies' tax competition for FDI inflows. *Economic Modelling* 29 (6): 2734-2743.

Koopmans, T. C. 1965. On the concept of optim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conometr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lanning,* edited by J. Johansen, 225–287. Amsterdam, Netherlands: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La, J. J. 2023.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family business inheritance tax reduction: Evidenc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rom South Korea.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8 (3): 446-461.
Lin, P. C., and M. F. Hung. 2016. The effect of energy service companies on energy use in selected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ynthetic contro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Economics and Policy* 6 (2): 335-348.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21. *Inheritance Taxation in OECD Countries.* (OECD Tax Policy Studies, No. 28). Paris, France: OECD Publishing.
Öztürk, S., and S. Suluk. 2020.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A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27 (3): 665-679.
Piketty, T., and E. Saez. 2013. A theory of optimal inheritance taxation. *Econometrica* 81 (5): 1851-1886.
Ramsey, F. P. 1928.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 *The Economic Journal* 38 (152): 543-559.
Rixen, T., and P. Schwarz. 2009. Bargaining over the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Evidence from German tax treaties. *Finanzarchiv* 65 (4): 442-471.
Sanjo, Y. 2011. Country risk, country size, and tax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1 (1): 292-301.
Srivastava, S., and S. Talwar. 2020. Decrypting the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iad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54 (2): 1-14.
Walczak, J. 2017. State Inheritance and Estate Taxes: Rates, Economic Implications, and the Return of Interstate Competition. (Special Report No. 235). Tax Foundation.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taxfoundation.org/research/all/state/state-inheritance-estate-taxes-economic-implications/.
Yurdadog, V., and M. Albayrak. 2019. Evaluation of tax competi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by panel data analysis. *Maliye Dergisi* 176: 298-3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